

講不盡的血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香港工人》月刊編·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訴 不 盡 的 血 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香港工人》月刊編

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訴不盡的血淚

——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出版者：香港朝陽出版社

香港城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一 元 七 角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版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三次印刷

前　　言

香港，這是一個號稱“現代化”的城市，到處是高樓大廈，滿街是汽車；入夜，霓虹燈閃耀着彩色的光芒。有人不斷地吹噓這裏的“繁榮”。

但是，香港畢竟只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無盡的苦難，和勞苦大眾結成不解之緣。“工業事故”的死傷數字，按年遞增，製造出一批批孤兒寡婦；新機器代替人手，失業、疾病伴隨而來。工人們不斷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進行團結鬥爭。

這幾年來，蘇美兩霸爭奪加劇，世界很不安寧。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經濟衰退，香港統治階層和壟斷財團競相轉嫁危機。香港工人，在受到更殘酷的壓迫的時候，更體會到兩霸的爭奪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帶給工人們苦難的根源。

這本小書，收集了十個發生在香港工人中的真實故事，試圖以報告文學形式來反映香港工人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上受剝削、在思想上受腐蝕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工人的團結互助和鬥爭事實。

我們出版這本書，主要是想通過香港工人們的真實事例，讓讀者認識此時此地勞苦大眾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

以及看清這個階級社會的實質。

本書的作者都是香港工人。他們用文學形式來反映生活還是一種嘗試，文章不免粗糙和不够深刻，但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香港工人已經拿起了筆，親手寫出了自己的苦難生活、團結互助和對現實社會的控訴。

目 次

前 言

失業羣中的人家.....	文 初	1
楊瑛的一家.....	青 萍	9
賭風毒霧下的一家.....	黎 芳	21
多技難傍身.....	卓 琪	41
苦難的青衣塘.....	華 強	48
在“華麗”的酒店裏.....	何 祥	56
阿鳳的遭遇.....	盧 明	61
海上的“奇蹟”.....	偉 志	68
在高樓大廈的背後.....	李 輝	86
司機與禁區.....	周一球	90

失業羣中的人家

服裝工人 文初

很普通的一個徙置區——現在被稱做“新邨”了。

徙置區也好，新區也好，新邨也好，改變一下名稱，並沒有改變這裏的貧窮。

特別是在不景氣的年頭，這裏，籠罩着失業的陰影。

中間走廊的盡頭，品字形的三伙人家。

三家的門全開着，人都走出來了，圍着其中的一家。這一家門前，還擺着一輛鐵製的運貨手推車。

人聲嘈雜。

“他們要搬胡嫂的衣車，聽說是老胡沒有繼續交分期。”

“老胡幾個月沒工開了，靠胡嫂車幾個錢公仔衫，怎能讓他們把衣車搬去！”

“胡嫂還在車公仔衫呢！”

老胡屋子裏，胡嫂果然還在拚命的趕貨，一串串公仔衫垂在衣車下面。

但是，衣車公司的人不能再等了。

衣車給抬走，胡嫂含着淚，收拾地下的公仔衫——還沒

趕得及起貨呢。衣車沒有了，還不知怎樣埋尾。

其他兩家人同情地看着零亂的胡家，愛莫能助。對門的鄭叔問：“老胡呢？”

“籌錢交租去了。”胡嫂說：“還不知交了沒有？”

“我去找他！”鄭叔便跑下去，找老胡。

隔壁的楊家，沒有大人在家，只得幾個級高級低的孩子，眼見胡家這場“變故”，都感到惶然。一個六歲大的女孩哇一聲哭起來。

“別哭！”十二、三歲的大姐姐，穿着媽媽過長的衣服，把妹妹拉回家去：“回來穿珠仔！”

妹妹揩着淚回去，姐弟幾個，又圍坐着穿起珠仔來。六歲的妹妹還是一邊穿珠仔，一邊揩淚。

你說她為隔壁胡家的遭遇難過嗎？也許她是有所感觸。他們的媽媽，半個多月未回過家了。

他們的媽媽楊嫂，跑到離島當生果小販，已有半年，通常十天八天回來看孩子一次；這次却去得特別久，孩子們都記掛着。

十二、三歲的大家姐做了一家之主，她要照顧弟妹，又要領着弟妹穿珠仔。

他們的爸爸呢？

牆上，歪歪斜斜地掛着一張“全家福”照片，那是三年多前一家人合攝的；那時，小弟弟還未滿週歲。

照片中那個高大的男人，便是他們的爸爸老楊。照片拍了不久，老楊就不在世間了。

老楊夫婦都是幹拆船這一行的，由於這個行業時旺時淡，有工開時忙得透不過氣，沒工開就沒着落，所以大都“好天搵埋落雨柴”。

就在三年前的一天，夫婦倆一連忙了一個時期之後，都病倒了。楊嫂好幾天沒去開工，只有老楊恃自己比較頂得住，不管自己有點發燒，還是顫巍巍地走出家門去開工。

楊嫂當然知道，拆船要揮動沉重的大錘，老楊病中，是不是頂得住？

她正待呼喚老楊回來，別去開工了。但是，看到那一級高一級低的兒女，想到拆完這船，又不知幾時才有工開，她又能說什麼呢？

就在這天的中午，楊嫂剛準備吃飯。突然，同老楊一起開工的工友驚惶地跑來。楊嫂心中一驚：“難道老楊他……”。果然，工友帶來不幸的消息：老楊受傷了。

楊嫂急忙趕到海邊拆船工地，看見丈夫已奄奄一息了。在生活壓迫下，老楊被迫帶病開工；工地又根本沒有安全設備，他被船上的水桶塌下壓住，血肉模糊，未送醫院，就已經死了。

從此，家庭重擔落在楊嫂肩上，由於丈夫在拆船工地慘死，楊嫂不再拆船，因為如果自己再出事，孩子們怎辦呢？她轉到紗廠做工，放工回來還穿珠仔。當時十歲左右的女兒也到五金廠做童工，勉強過活。到了一九七三年底，紗廠開始淡了，楊嫂每星期只能開工兩天，每月只得一百數十元收入，一家七口怎過活？楊嫂只好又到木箱廠當雜工。但隨着

行業不景，木箱廠也關閉了。楊嫂失業，只好轉行當小販。但市區內因失業人多，早已攤檔林立，她插不進去，只好帶着四歲大的最小的兒子，到離島向親戚借了隻小艇，在艇上賣點生果，希望賺點錢度日。其他孩子，便留在家裏穿珠仔。

這次，楊嫂半個多月沒回家，孩子們都牽掛着。這六歲的妹妹常常哭，眼淚鼻涕把臉都漿住了；大姊姊忙忙碌碌，也沒空替她洗。其他幾個，衣服又破又髒，像一羣小乞丐。他們一邊穿珠仔，一邊注意走廊，看有沒有媽媽的脚步聲。然而沒有，他們等到的是隔壁胡家的一場不幸。

這時候，對門的鄭叔，已經跑到新區辦事處，他找着老胡了。

只見老胡正在捱罵。那個年輕的區長，指着老胡說：“你每次都這樣遲才來交租，再這樣，你就搬走吧！”

老胡說：“我沒有錢才遲交啊！”

“沒有錢就不要住新區！”區長把他喝出去了。

鄭叔接着老胡，說：“只不過遲了幾天，就說要人家搬走！”

“真是不吃飯也得交租！”老胡說：“這還是求公仔衫廠的老闆娘借了一期糧，又去找幾個工友，才湊够了來交的！”

“老胡，你的分期付款衣車剛給抬走了！”鄭叔這才說：“胡嫂的公仔衫還未起貨呢！”

“搬了？”老胡呆了一呆，搖搖頭：“想不到，我做了二十幾年時裝，現在連公仔衫都沒得做了！”

“你做了二十幾年時裝？”鄭叔好像有點意外：“我知道你在服裝店做，可不知你——”。

“人家都說我是老師傅，老行尊。”老胡苦笑：“十多歲就做時裝了，一兩年前還沒問題，但去年我開不足四個月工，時裝店關了一家又一家，我到處奔跑，不是沒有空位，就是說我年紀大了。唉，我不過四十多歲，這便老了麼？”

“那現在怎辦？”鄭叔問：“大人可以餓一兩餐，小孩却捱不得肚飢的！”

“對對，老鄭，我正要問你，哪一間米舖還有米賒呢？”老胡道：“我相熟的兩間，都前欠未清呢！”

“我也没有辦法。”鄭叔說：“我是拿了屋證，到前邊那座的米舖去抵押，才賒了五十斤米的。”

“屋證在這裏，你帶我去！”

兩個走向前面那座徙置樓。

鄭叔，他是做塑膠的，在不景氣中，他也十個多月沒工開了。

膠業工人的收入本來就低。前幾年，工廠比較旺，鄭叔長期捱兩班，一天十六小時工作，還要妻子在家穿珠仔，每日得二、三元來幫補家用，才能勉強維持一家幾口。一九七三年大半年，塑膠業吹起淡風，鄭叔每星期只能開工二、三天。一家幾口，就連買米都不够。

鄭叔把過去節儉下來有限的現錢都用光了，滿以為過了淡季會好一些，想不到一九七四年初，工廠更淡，鄭叔被解

僵了。

失業後，鄭叔東奔西跑，尋親訪友找職業。轉眼半年，一天工都沒得開，只好先把兩個月大的女兒送了給人。唯一讀書的三女兒也被迫停學，在家幫母親穿珠仔。一家人日穿夜穿，只不過得三幾元。想無可想，又把一個兒子寄放在外婆家。當票一大疊，不少已經過時，未過時的，眼看也沒辦法去贖了。

前幾天，他搬了五十斤米回家，老胡還以爲他有辦法，誰知已出到最後一招，連屋證都拿去押了！

老胡也押了屋證，賒了五十斤米。鄭叔幫着他，拾回家裏。

樓梯上，遇了楊嫂。

楊嫂帶着四歲的小兒子，拖着疲乏的身軀回來。

“楊嫂，這次去得很久啊！”鄭叔說：“兒女們都記掛得很呢！”

“有什麼辦法？世界不景，買生果的人都少了。”楊嫂道：“生果賣不出去，多歇一天就爛掉，回來一趟，又要花許多車船錢！”

楊嫂還未入屋，那六歲的女兒就哭着撲出來了。那幾個大的放下手中穿着的珠仔，呆呆地看着憔悴的媽媽。

楊嫂看見這幾個衣衫襤襤，穿珠仔穿得頭昏眼花的幼小兒女，也不覺一陣心酸。

她的心難過，而且還有隱隱的憂心，連生果都要賣不下

去了，以後，又能做什麼呢？

楊嫂正拿起毛巾，倒了一盆水，給六歲的女兒揩臉，却聽見外面走廊上忽然熱鬧起來。鄭叔在喊：“老陳，進來坐，你怎麼又來了？”老胡也喊：“老陳，這邊坐吧！”

“是老陳！”楊嫂也驚喜地站起來，正待走出去打招呼，老陳却踏進她家來了。

“楊嫂，那麼巧，你在家！”老陳道：“還是先來探望你。回來多久了？”

“剛進屋！”楊嫂道：“老陳，請坐。唉，屋子亂得很！”她一邊收拾着。

老胡、鄭叔都進來了，胡嫂也收拾着她那未起貨的公仔衫，站在門邊。

“工會派我，又來問候你們三家。”老陳道：“你們三家都登記了失業，都是困難戶，近來又怎麼了？”

鄭叔和老胡相對苦笑，向老陳道：“老陳，有你來，我們就不怕！”

“我也失業了一年了。”老陳道：“不過，我們越是困難，就越要鼓起勇氣，互相幫助，依靠集體，依靠工會。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景，帶給我們勞動人民苦難是太多了，又何止我們四家人呢！”

“不錯，我的生果也少人買了！”楊嫂道：“老陳，你身強力壯，識做幾個行頭，也找不到工做，真是不成世界呵！”

“老胡的衣車也給人家抬回去了，公仔衫也車不成了。”鄭叔說。

“失業的威脅，我們也不只經過一次了。”老陳說：“我十二歲時，正是抗戰時期。我家在淪陷區的海豐，父母相繼餓死了。我到處流浪，要不是鄉親幫助，也早餓死了。來到香港，睡在街邊，不知被警察的皮靴踢過多少次，經常失業，跟鄭叔一起做了十年塑膠。雖然沒有家庭負擔，但平時有工做也只能糊口。失業一年，便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幾十年捱盡辛酸，真想過要自殺。要不是工友的關心，工會集體的幫助鼓勵，我陳某人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但我們不應當消極，一定要奮鬥下去！”

“胡嫂，不要怕，我去想辦法借架舊衣車來。”鄭叔道：“借不到時，就一起穿珠仔。老陳說，我們不應消極呀！”

想起了共同的遭遇，鄭叔、老胡夫婦、楊嫂，總算認識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如此帶來我們勞苦人的苦難。但大家一定要互相依靠，有工會把大家聯結在一起，大家就有面對困難的勇氣！

楊瑛的一家

製衣工人 青萍

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罄竹難書；勞苦大眾的痛苦，數之不盡。楊瑛一家的遭遇，是萬千工人家庭中的一個例子。

一九七三年底，西方經濟危機風吹香港，失業半失業威脅着工人，多少工人為生活愁。那是農曆除夕的深夜，正是有錢人家吃過“年夜飯”，通宵逛花市的時候，製衣青年女工楊瑛一家却陷於愁雲慘霧中。亞瑛又凍又餓，心力交疲，正朦朧地在牀上蜷縮着。忽然吹來了一股凜冽的寒風，把她凍醒。“哎，關上的窗門怎麼打開了呢？”她從牀上走下，急急去關窗，窗口擺着的一張櫈子險些把她摔倒。這時街上傳來一陣喧嚷聲，亞瑛才發覺母親不在牀上，心中驀地一驚。

母親臨睡前的憔悴情緒浮現出來，亞瑛心中閃過一個可怕的預感。她撲到窗邊，往下一看，街道上圍了一堆人，喧鬧着，有些人還抬頭看，舉手指點……。“難道，媽媽她……”亞瑛彷彿全身墜進了冰窖裏，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媽媽，媽媽！”她在房內高聲大叫，希望能夠把媽媽叫出來。四個弟妹都驚醒了，也一起高叫。但哪裏有媽媽的親

切的回音！亞瑛和弟妹們叫着“媽媽”，狂奔下樓。街道上，果然躺着渾身鮮血、奄奄一息的母親。五姐弟抱着母親的身體，呼天不應，叫地不聞，還等不到救傷車來，母親便斷了氣。

想不到在這個除夕，一家人只吃了一頓粥，母親便永遠離開了他們！亞瑛悲痛欲絕，她一次又一次地哭叫：

“媽媽，你爲什麼這樣忍心拋下我們幾姐弟啊！”

當然，亞瑛也知道媽媽不是“忍心”，忍心的是這個社會！十幾年的苦難日子在亞瑛的腦海中反覆翻騰。在這些日子裏，母親飽嘗辛酸苦楚，沒有停過勞動，沒有嘗過溫飽。倔強的母親，多少血淚的日子都咬着牙根捱過了，誰料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失業浪潮，最後竟奪了她的生命。

窮人的命爲什麼這樣苦？亞瑛的母親用死控訴了這個吃人的社會。

楊瑛是汕頭人。二十多年前，她的父親因爲在國民黨統治下無以爲生，迫得離開妻子和剛滿週歲的楊瑛，跟同鄉的親友跑到香港做工。可是一去七年，杳無音訊。亞瑛的母親接不到丈夫的訊息，又不知道他到底是生還是死，便在十多年前，拖着年幼的亞瑛，從汕頭來到香港，找尋丈夫。

人海茫茫，到哪裏去找呢？步下火車，她們感到惘然，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養牛場當工人的姨父身上。姨父把她們接到牛奶公司薄扶林村的家裏。姨父很窮，一家七口生活困難，就住在牛棚裏。但窮人才知道窮人苦，姨父還是把她兩母女收容下來。年幼的楊瑛，初時還以爲，住在牛場，無飯

吃都會有牛奶飲，但她從未沾過半滴牛奶哩。她開始懂得，這裏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不是我們勞動人民所有。姨父的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現在何堪再百上加斤呢？！姨父得了肺病，身體越來越瘦，可捉襟見肘的生活哪裏有餘錢看病？母女倆眼見及此，再不想加重姨父的負擔，只好天天奔跑，四處找尋父親的下落。經過一段時期，她們終於在青山道的一家小茶樓裏找到了做廚子的父親。

看到了父親，母親和亞瑛都嚇呆了；真是連發夢也想不到，千辛萬苦才找到的父親竟變成了這個樣子：他鬚長及胸，髮長到腰，面無表情，目光呆滯；見到她們母女倆時一些反應也沒有，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原來他到香港後不久，由於環境的複雜，生活的重壓，便得了精神病。茶樓老闆利用他只懂得做工，不會支取工資的“特點”，不分日夜地迫使他勞動，替老闆賺錢；但老闆又怕他的怪模樣出現會嚇走了顧客，就把他關在濕漉漉的廚房裏，只在牆上開了個洞，讓他把菜弄好了就遞出來。奴隸般的奴役把亞瑛父親折磨得不似人形，兩頰深陷，衣衫襤襯，油污滿身。

母親十分痛心，離鄉時年輕力壯的大好青年，竟變成了這個樣子。但是能够找到父親，總是好的。茶樓老闆唯恐失去了這個不花錢的勞動力，竟想把母女倆趕出去，父親幾年的工資，老闆說什麼是她父親花光了，楊瑛父親又哪裏懂得爭辯呢？但身邊一個錢都沒有，又到哪裏去棲身？說盡了多少好話，她們才能從茶樓老闆手上“借了”十多塊錢，買了一張席、一個竹籃、一個火水爐、一個瓦煲，在茶樓附近一條小

巷裏露宿。

爲了應付生活，母親千方百計地托人在一家毛衫廠找到一份雜工。白天上工，就把亞瑛整天放在竹籮裏，看守那些“傢具”，恐怕被人當垃圾掃去；又擔心警察來趕，控告她們“阻街”。年幼的楊瑛，每天一看到警察的影子，便拉着這個“家”躲在樓梯底，晚間才敢到街邊睡。碰到加班趕貨，廠方鎖起廠門不准放工，母親就被迫通宵開工，亞瑛便瑟縮在街頭等母親，捱餓到天亮。沉重的勞動，苦難的生活，使母親的身體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疾病。她真想返回鄉間，可是哪有錢做路費呢？又怎能拋下患精神病的丈夫不管呢？她只好捱下去。母親胼手胝足，好不容易才能把父親送去精神病院治療。但香港醫院大門八字開，哪裏是我們窮人治病之所？父親的病才稍有好轉，便被醫院趕了出來。白天仍然在茶樓做工，晚上同她們一起睡在街邊。

後來，在母親同廠工友的關心幫助下，一家人搬到徙置區。只有半邊房子，僅容一張床，但總算比住在街邊好一些。本以爲居住的問題，暫時可以得到解決，但住不上幾天，就被官員們以“非法”居住的藉口趕了出來。那時正是寒冬季節，一時間又去哪裏棲身呢？母親唯有與他們理論，要求待找到地方才搬，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責罵。他們動手把屋裏的衣物丟出來，全家人僅有的幾件破衣和破棉被，被狠狠地丟到臭水渠裏。天寒地凍，一家人從床上被趕起，着的衣服都不多一件，只好從地上、臭水渠裏，檢起一二件未濕透的衣服披上，一家人悽淒惶惶、瑟縮街頭。

後來，在工友的協助下，她們搬到另一個人家裏借住。由於擔心被第二次趕走（除了被趕走之外，還會累及借屋的工友，而被收回屋宇），只好閃閃縮縮地過日子。有官員來巡視就到外面躲起來，走了才敢回家。但官員總是在人們熟睡的時候搞突然襲擊，三更半夜，天寒地凍，她們有時躲在廁所裏，有時一家人分散睡在樓梯，真是苦不堪言。就這樣，她們提心吊胆地住下去。

楊瑛十二歲那年，母親生了第二個弟弟，不能去做工。無法可想，只好讓亞瑛到工廠當童工維持家計，但這裏的所謂“保護婦孺法例”，規定未够年齡不能到工廠做工，怎辦呢？楊瑛的母親向鄰居借來身份證，讓亞瑛穿上與年齡很不相稱的服飾，打扮得大一些，拿着借來的身份證，報大年齡去見工。見到了工廠管工，想到了一家大小的生活，懂事的亞瑛拚命地把自己伸高，臉上的稚氣一下子消失了。要不是這樣，亞瑛真擔心找不到工作。在低廉的工錢下，楊瑛就開始了每天八個多小時的童工生活。

儘管入了工廠，但亞瑛的年幼，人家一眼就看得出來，哪裏像是十四、五歲的童工？再加上長期缺乏營養，體格就更顯得細小。因此“勞工處”人員到來“檢查”的時候，差點兒又把她的飯碗打爛了。哪一天工廠內“鈴”聲一響，亞瑛就得和其他童工一起“走鬼”，躲藏在木箱內、機器底，有時焗暈了也沒有人知道。如果被“勞工處”的官員捉到，罰了老闆的錢，老闆就將氣出在童工的身上。重者開除，輕者扣人工，有時還要捱耳光。年幼的楊瑛就是想不通：為什麼我們住屋要“走

鬼”？工作也要“走鬼”？爲什麼我們要閃閃縮縮的過日子呢？

母親爲了解決住的問題，希望買一間山邊的木屋，千方百計的向工友籌借了四百元，但還不够錢，屋主開價是八百元，還差四百元。家無長物，再沒有辦法了。但假如失去機會，以後要買也不容易一下子找到；提心吊胆住下去也不是辦法，唯有向“大耳窿”借高利貸。高利貸要有抵押，但他們有什麼可以抵押的呢？“大耳窿”狡猾地指着楊瑛說：“她可以做抵押品”。“合約”限期半年本利清還，過期還不清，就要將亞瑛作抵償。亞瑛害怕得一下子躲在母親身旁，擔心“大耳窿”要帶走她。母親心裏更加矛盾，要是半年還不清債務的話，這四百元就會累了女兒的一生。但不借，今後一家大小又如何棲身呢？只好含着淚簽下了借據，接過了這四百元，買下半山的一間小木屋。

亞瑛爲了養家，也爲了贖回自己，每天起早摸黑，拚命做工。後來，她轉到製衣廠當女雜工。女雜工工資很少，所以她希望能坐車位，靠着自己的拚命搏，可以多些收入。廠裏有一位左腳跛的女工亞蓮，遭遇也是很苦，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只剩下她和老母親相依爲命。腳不方便，找工作就更加不容易了。爲了這份工，她每天清早就從鯉魚門轉車到青山道上工。剛開廠時，由於一下子請不到人，廠方錄用她已經幾年了。廠方一有雜工或女童工請到時，總想把她迫走，用童工代替，因此對她多方挑剔。那天，悲劇終於發生了。早上楊瑛協助亞蓮領回衣服，這差不多已成了她每天的習慣，共同的遭遇使她們互相之間特別容易了解，楊瑛對亞蓮十分同情。

亞蓮剛一踩車，就走線，自從前幾天換了車以後就這樣，車出的東西總是要重做，她向老闆講了幾次，要求校車，但總是沒有結果。亞蓮也知道這次換車，又是資方想迫走她的做法，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唉……，亞蓮只好忍氣吞聲地小心車，希望過些時候有空車，換過一部算了。一直到中午吃飯的時候，亞瑛看到亞蓮手上被車針扎滿了血，關切地對她說：“蓮姐，叫老闆找人校校車啦，這樣很難車的。”亞蓮含着淚，希望亞瑛想講又不知怎樣講。她打開飯盒，拿匙羹的手指還在作痛，恰巧老闆走過，亞蓮就對老闆講：“王先生，這部車很難踩，麻煩你找校車師傅幫我校校。”老闆冷笑道：“這部車不是很好嗎？哪裏還需要校！我看不是部車要校，而是你隻腳有問題！”說完拂袖而去。亞蓮氣憤得流出了眼淚，楊瑛看着她放下了飯盒跑出去，只好替她擺好飯盒開工去了。從此一連幾天，都看不見亞蓮上工。一天，就快放工的時候，老闆帶着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太婆進廠，叫楊瑛帶她去收拾亞蓮的東西。亞瑛打開飯盒，都發霉了，還以為亞蓮轉到其他廠去了，就問，“阿婆，蓮姐去了哪間廠啊？”亞蓮媽捧着飯盒突然抽泣起來，旁邊的工友都關心地圍過來，老婆婆說：“我的女兒亞蓮她，前幾天跳海死了，我剛剛領完屍回來。”說完又泣道：“我幾十歲，今後都不知如何生活？”誰害了亞蓮呢？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又添上了工人的一筆血淚賬。亞蓮的影子始終清晰地在楊瑛腦子裏浮現，為什麼我們窮人的命總是這樣苦？年幼的楊瑛當時又怎會懂得呢？這時老闆却假仁假義地叫楊瑛坐亞蓮留下的空車位，亞瑛又想坐，但想起亞蓮的時候，又怕

鬼。她想到坐上了車位，人工多些，就可以早日贖回自己。想到這些，亞瑛就答應坐上了車位。老闆爲了推卸責任，還故弄玄虛，叫楊瑛出錢買燒肉在亞蓮車位前跪拜，才准開工。楊瑛千辛萬苦捱了半年，總算還清債務，才不致被賣給人家。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窮人的苦難哪裏有盡頭？一九六五年大旱，香港四天才供應食水四小時。亞瑛一家住在木屋區，沒有自來水，平時已經要由山腳担食水上山，遇到這個嚴重缺水的年頭，母親只好揹着楊瑛的一個弟弟去排隊輪水。一天，挑着兩個桶下山時，還是陽光燦爛，但排着隊輪水時却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孩子發起高燒來，瑛媽賒借無門，只好到丈夫工作的茶樓向老闆借錢，說盡了多少話，老闆才答應借五元。爲了這五元，瑛媽足足花了一個早上，好不容易才把孩子送到了醫院。經過醫生的檢查，原來孩子患了腦膜炎，醫生問過了情況，不滿地對瑛媽斥問：“爲什麼到現在才送來醫院？”瑛媽千辛萬苦才借到了五元，又怎樣能向醫生講清呢？

在木屋區居住，不知捱過多少風風火火，就在楊瑛的另一個弟弟出生後，家庭開支更加大了。母親只得馬上到工廠上工，每天就把幾個弟弟鎖在木屋內，讓他們互相照顧。那天，亞瑛像往日一樣，拖着疲乏的身體，急急腳地趕回家看管弟弟。楊瑛回到家，母親還未回來，看看鐘，六時多，才記起母親開夜工到八時半，九時多才回得來。剛要動手煮飯，突然聽見大叫“火燭呀！火燭呀！”轉眼已看見旁邊一間木屋冒出濃烟。亞瑛馬上找了張棉被，把剛滿月的弟弟包住，跟住挾住了第三個弟弟，拖着比較大些的大弟弟便跑。

她無閑顧及衣物，趕忙把弟弟帶出火場。火場四周一片混亂。亞瑛只顧着領弟弟猛走，好不容易才把弟弟領到火場外的空地上，她正想安置弟弟休息，打開了棉被，她呆住了，四弟不在棉被內。她放聲痛哭，“怎麼辦呢？弟弟不見了。”她囑咐好兩個弟弟不要走開後，發狂地跑回火場。幼嫩的弟弟究竟在哪裏滑出來了呢？混亂的火場裏，弟弟要是找到，又是否生存呢？她一邊跑一邊想，逢人便問，一路上都沒有看見弟弟。難道弟弟還在屋內？火頭就快燒到了。亞瑛顧不了這些，想到弟弟，她拚命地往火場裏跑，衝進屋裏，看到弟弟正在地上“嘩！嘩！”地哭叫。亞瑛驚喜萬分，急忙把弟弟抱着就衝出來。剛跨出門口，火燄已把整間屋吞噬了。母親放工回來，看到家園被毀，僅救回一張棉被，以後又怎樣棲身呢？但一家大小能脫險，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經過大家齊心交涉，他們才同其他災民一起搬入荃灣徙置區。

本來住上了樓房，不再受風風雨雨和火神的威脅，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能住上這簡陋的樓房，他們一家還是第一次啊！貧困的生活使她們連做夢也想不到會住上樓房的。誰會想到，在木屋區生活上稍為安定了片刻，又要搬到徙置區，生活又再出現百上加斤？住徙置區，既要交租，又遠離市區，一家三人出外工作，交通費也不少，物價不斷飛漲，胼手胝足也僅能維持生活。亞瑛每天拚命地做啊做的，放工步下工廠的樓梯也要扶着歇幾下。出到廠門口，經常覺得天旋地轉，不知哪裏是回家的方向，就靠着藥油來刺激精神。身體更瘦弱了，臉色更青白了。少做一些嗎？生活又如何維持

呢？不吃也要交租啊！一九七三年底，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很多工廠停工關廠，就算仍在開工的工廠也是開工不足，製衣業也處在半停工狀態，楊瑛和母親都處於半失業狀態。但這時，香港物價却是急起上漲。食米漲到兩元多一斤。儘管一家三口拚命地去做，生活仍然十分困難。但災難接連而來。香港社會風氣極壞，到處搶劫，危害居民生命財產。那時父親在茶樓，已從廚師轉為洗碗。老闆為了節省開支，每晚收工，就叫父親留下兼做看更。那天晚上，夜深人靜，父親朦朧地被人綑綁，用麻袋包着，打得遍體鱗傷。第二天一早，工友起床開工時，發覺茶樓被劫，才從一個角落裏把他從麻包裏放出來。這次父親被毆傷，精神又受到打擊，躲在家裏，幾天不敢上工，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生活，再失去一個勞動力，就更困難了。母親只好勸慰他上工，“我同亞瑛現在經常返一日停一日，你再不上工，幾十樣開支怎樣應付？你還是上工吧！”父親只好回到了茶樓。但現實却是這樣殘酷，事隔兩個月，父親工作的茶樓又再次被劫，父親被匪徒用鐵綫把他全身緊緊地綑綁，毆傷得更加嚴重。再次受到這樣的驚嚇，他的精神病又嚴重起來了，整天躲在家裏，喃喃自語道：“他們要打我，他們要綑我。”從此父親再也不能做工了。父親的病變，家庭又再蒙上暗淡的陰影。

楊瑛這些天來都沒有工開。楊瑛的父親的精神病又越來越嚴重，孩子們級高級低，今後的生活怎麼辦呢？楊瑛的母親更加愁眉不展。為了使孩子們能多吃一口飯，母親自己只

好以冷粥充飢，身體越來越差，常常感到肚痛，但也只好咬着牙支撑下去。老闆早就有意要把她開除，要是請假看病的話，老闆就會借故收回車位了，加上正是百業蕭條，工廠遍吹淡風，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她維持，失去了工作怎麼辦？有時母親實在忍不住痛楚，稍停一下，但老闆就立即用一捆衫照口照面地擲過來。母親只有帶着滿腔仇恨，到廁所裏擦乾眼淚再做。加上資方爲了保護產品，工廠在冬天也開冷氣，這就更令人難受了。有病在身的母親，棉衣也沒有一件，只好把夏天的衣服全部穿上。但狠心的老闆，還要說她穿得“不三不四”、“有礙觀瞻”，不准她穿。到了農曆年二十八，母親終於不能支持，由工友拼湊了七塊錢，讓她到工廠醫療室看病。但這個“醫療室”規定十二元看一次病，母親拿着七塊錢，看不到醫生，含淚回到車間。好不容易才捱到收工。次日，是年二十九，有人高高興興地籌備過年，但母親仍然要帶着疲乏的病體，回到工廠開工。

到了除夕，一家七口，只能喝稀粥“團年”。母女倆核算着：過年工廠停工幾天，家裏一點餘錢也沒有，生活怎麼過呢？“媽媽，我有一身力氣，我可以做工，但沒有工開，又有什麼辦法呢？”楊瑛看着瘦得使人心痛的母親，看着擠在床上睡着了的四個弟妹，內心有說不出的痛楚。

母親沒有答她的話，神情很憂鬱。楊瑛很了解母親，知道母親受的折磨太多，太重了。但她沒有想到，母親會在她們姐弟睡着之後跳樓自殺！

工會知道了這件事，十分關心她們，立刻派出工友來慰

問，幫助他們辦理母親的後事，解決一些暫時的困難。還和他們一道訴說了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揭露了苦難的根源。工友們的互相關懷和教育啓發，打開了楊瑛的眼界，她挺起胸膛，帶着對吃人社會的刻骨仇恨，說：

“對，工會說得對！我現在才明白，我們一家的苦，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帶給我們的！為什麼我爸爸被迫瘋了？為什麼我十二歲就要當童工？為什麼我們露宿街頭也要‘走鬼’？為什麼媽媽在年三十晚要自殺？為什麼？……為什麼？……”

楊瑛問得好。千千萬萬受壓迫受剝削的人都有權提出嚴正的質問。有錢人渲染成“天堂”的香港，真是勞動人民的十八層地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下，苦難深重的又豈只是楊瑛的一家？

賭風毒霧下的一家

紡織工人 黎 芳

香港工人，不但受到精神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慘剥，而且思想上還受到形形式式的腐蝕，真是苦難重重。

黃、賭、毒、飛，長期以來，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膿瘍。它們臭氣四溢，流毒遍佈，害得多少人變成了鬼，害得多少人家散人亡！這是對勞動人民敲骨吸髓的又一種非常毒辣的陰謀手段！近年來，這“四大害”進一步嚴重化，尤其是對青少年伸出它的魔爪，處心積慮地妄圖毀滅香港同胞和工人的下一代。在這個表面上使人目迷五色的“花花世界”裏，到處充滿了複雜、尖銳、驚心動魄的腐蝕與反腐蝕的鬥爭。

“是這個萬惡的社會，毀滅了我的一家！”青年紡織女工阿琴在控訴。這是充滿了悲憤和仇恨的控訴！也是千千萬萬受害者的控訴！

阿琴今年才二十二歲。一九七四年六月以前，在工友印象中，她是一個沉默、愁苦而從來不提起自己身世的姑娘。大家只知道她有八姐妹，還以為她只是為一家的生活而擔憂，

沒有想到她這家人的苦難之深，到了使人難以想像的程度。

阿琴的父親，原籍寶安，世代居住新界葵涌，是個勤勤懇懇的艱苦過日子的菜農。阿琴的母親，是一個在地主家受不住欺壓逃跑出來的貧農女兒。他們結婚之後生下第一個兒子。一家三口，住在葵涌的鄉村裏，種菜度日。雖然很窮，靠了自己的辛勤勞動，日子總算還可應付。

過了幾年，又生了幾個孩子——大哥阿賜，二姐阿琴，三弟阿和，四妹阿雲，生活開始困難起來。種的菜很難賣出去，而且價錢賤。阿琴七歲的時候，在附近的學校讀書，放了學回來，就要揹着四妹阿雲挑水、淋菜、拔草，爬山下坡的負擔沉重的勞動。生活對他們一家是折磨，是考驗。例如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溫黛”風災，便帶給他們更大的苦難。阿琴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早一天，掛起了五號風球。家中已經沒有什麼吃的了，媽媽自己餓着肚子，把剩下的一點食物留給兒女。想到可能真要打風，總不能幾天沒有糧食，媽媽半夜起身割菜，趕着在天亮前挑到菜欄，打算賣了買些米回來。可是風來得急，來得猛，媽媽在路上幾乎被風吹下海，是爬着回來的。回到家裏，衣服破爛，全身都是損傷，菜當然全沒有了。颱風過後，菜地被山泥蓋住了，連菜種都沒有錢買，還欠下了不少米賬。這一年的除夕、新年，全家只能喝粥水……。”

當時阿琴才十歲，她本來讀小學三年級，因為沒有錢，遲交學費，被學校趕了出來。沒有書讀，家庭又困難，於是開始去一家醬園做貼商標的童工，每天只有一元多的工資，

還要被領班的老婆迫她做私人奴婢的工作。捱了兩年，十二歲，阿琴向別人借了“兒童證”，托工友介紹，進了遠×紗廠做細紗徒工。

“那時候，我在全廠是年紀最小的。”阿琴說：“開始我不懂細紗機的性能，氣力又不够，在縛紗的時候常給機器彈傷……”她伸出雙手，十指滿佈傷痕，“還流着血，領班劈頭就罵：‘受了傷，就不用做嗎？’我的手痛得連紗結也打不上，也得捱下去。徒工規定要在廠的宿舍住，不准回家，連媽媽也見不得一面。想不做了，但記起學師時交了一百多元的學師費，記起媽媽希望我學會細紗，流着眼淚，又回到細紗機旁……”

在遠×做了一年，阿琴是個熟練工人了。她轉到漢×紗廠，做中、夜班，這年十三歲。廠方欺負她年紀小，專門叫她管壞機，做了兩年還沒有固定機位。她掛念着要養家，只好逆來順受，不敢進行鬥爭。有一天做夜班的時候，廠方又欺負她，要她中途去管壞機。阿琴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把廠方痛罵了一頓。工友都支持她，人心大快。但阿琴為此，離開了這間紗廠。

在此之前，一九六四年，她的家庭又起了變化。

當局為了賣地賺錢，把葵涌農民的田地都沒收了，再沒有菜種了。父親在一些同姓“兄弟”的欺騙和引誘下，到“大檔”（賭檔）做工，母親也去東×紗廠做雜工。母親是個十分勤勞的人，在做雜工的時候學會了打紗，於是轉到南×紗廠打紗。到南×後，母親生了八妹阿蓮。兄姐們十分喜愛阿蓮，都管她叫“玲玲”。可是母親生產時由於流血過多，從醫院

出來後一直在暈。四十天的無薪假期過去了，想再休息，回廠告假，被廠方罵了一頓，說那麼窮還要學人告假。母親氣不過，離開南×紗廠，轉去榮×紗廠。這時，正是阿琴在漢×紗廠罵了廠方辭工出來。她從紗廠回家，一路上生怕母親責備，可是不回去告訴母親也不行。哪知道母親竟稱讚她：

“阿琴，做得對，有志氣！”

阿琴真高興啊，母親支持她的鬥爭，使她得到了信心和安慰。但是，窮苦人家停了手，現在怎麼辦呢？

母親說：“聽說榮×要落人，我帶你去吧！”

阿琴跟母親進了榮×紗廠。

天下烏鵲一樣黑。榮×的老闆對工人的壓迫剝削也是極其刻毒的。一九六八年十月，母親腰痛，腿腫，身體越來越差。但是老闆規定，完全沒有“休息”才能得到“年獎”。爲了能够得到“年獎”，母親忍着病痛，不敢告假，捱了一天又一天，終於捱過了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一日。母親想，總該可以得到“年獎”了吧，身體也實在支持不下去，便向老闆請假。可是黑了心肝的老闆硬說她是藉口病假去“跳廠”，不批准。不批准她也做不下去呀，母親只得留在家中休息。到了舊曆年底，阿琴扶母親回廠出“年獎”。老闆說：“你沒有我准許告假便不上工，沒有年獎！”母親氣極了，同老闆吵起來。工友們知道了，大家都很氣憤，一致支持她們爭取應有“年獎”的鬥爭。他們高聲質問老闆：

“你憑什麼不發馮蘭（母親的名字）的年獎？”

“人家做了一年，捱病返工，有什麼理由不給年獎？”

工友們噓聲大起，老闆無可抵賴，被迫發了半個月（照規定是一個月）“年獎”。

母親的病一天天嚴重了。捱到四月，已起不了床，父親和阿琴把她送去某公立醫院。經過診治後，醫生不滿地說：

“為什麼不早入醫院？”

誰不知道有病要看醫生，住醫院？誰願意受疾病的折磨？誰願意被疾病奪去生命？這個醫生知道勞動人民的苦難嗎？……

診斷結果，母親是腎病加上骨癌，太遲了，無可醫治了。母親自己也知道了，她在病床上拉着阿琴的手，好不容易才斷斷續續說了幾句話：

“阿琴……我不在……你要帶大弟妹……可不要給別人呀……”

阿琴握着母親的手，只是流眼淚，說不出話。

她多麼想一直伴在母親的身邊，可是不上工不行，一家要生活呀！那一天，她放工回家，發覺家裏空蕩蕩，一個人人都沒有。她心裏猛地一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天色昏暗下來了，沉沉地壓在她的心上。她有點迷惘地坐在屋子裏，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待什麼。

“二家姐，二家姐！”三弟阿和從外面氣喘喘地趕回來，一見了她，聲音就哽咽了。

“……”阿琴站起來，想問，問不出聲。

“媽媽……她……死了！”

阿琴哭得十分傷心。以後怎麼辦呢？

辦後事也成了問題。父親像傻了一樣，出殯也沒有錢。阿琴依靠誰呢？她痛哭着，回到榮×紗廠找工友。工友們紛紛捐了錢，陪着她去見老闆，要老闆把還扣住不發的半個月“年獎”拿出來。

“要有死亡證！”老闆說：“有死亡證，我當帛金給你，沒有死亡證就不發。”

工友們氣極了，大家嚴詞駁斥：

“馮蘭工友就是你的年獎累死的！這是她用性命換來的錢，是她應得的。當什麼帛金？還要死亡證？真是豈有此理！”

工友支持阿琴進行鬥爭，取回了母親半個月“年獎”，又在工友協助下，辦了喪事。阿琴對榮×紗廠的老闆恨死了，她轉去龍×織造廠。

可是，真正的，更大的不幸，這時才開始！

她的大哥阿賜，小時候和她一起勞動、理家，本來是個好孩子。後來進入一間公立學校讀書，讀了幾年，就變成了一個“飛仔”。母親還未死的時候，他就被人加以“想搶劫”的罪名，拉到“感化院”去監禁了兩年。放出來之後，完全變壞了。母親、父親勸告他，他也表示想改過，已經去做了毛紡工人。可是飛黨毫不放過，繼續對他威脅。母親死後不久，大哥第二次被捕。父親對母親的死十分傷心，對大哥的變壞十分痛心，思想出現了混亂，“大檔”裏有壞人乘機引誘他，於是，在母親死後三個月，父親吸上了鴉片烟。

阿琴最初還不知道，只是放工回來，看見父親越來越垂

頭喪氣，萎靡不振。接着，發覺父親開始當、賣家裏的東西。她很奇怪，很懷疑，追問父親有什麼問題，父親不告訴她。

有一天，父親不在家，一個大漢摸上門來。阿琴認得他是“大檔”裏的人。這個人聲稱要追回父親吸毒用去賭檔的三百元。

彷彿一個焦雷在頭上爆炸，把阿琴嚇得魂飛魄散。父親吸了毒，怎麼辦？她意味着一場災難已經臨頭。這一晚，她徹夜不眠等父親回來，又傷心又害怕。

第二天，好容易等到父親回來了。她一把抓住問：

“爸爸，你，你吸了鴉片？……”

她多麼希望父親給她一個否定的答案啊。父親有些意外，他愣了一下，可是接着說：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她哭着哀求，叫父親不要吸毒。可是，正如阿琴後來認識的那樣：“爸爸本來是個好人。他對媽媽真好，從來沒有爭吵過。對兒女，他也很關心，愛護，是個好爸爸。可是，一吸上毒，就整個人變了，不再是以前的爸爸了！縱容販毒的人真毒啊！”

父親沒有聽她的話，繼續吸毒，當東西，問女兒、問老祖母要錢，經過幾個月，家裏羅掘俱窮，情況越來越不對了。

那一天，小弟弟從外面跑回來，告訴阿琴：

“二家姐，二家姐，爸爸把妹妹抱走了！”

“父親把妹妹抱走？抱到什麼地方去呢？”一想到父親是

個“道友”，阿琴從心裏冷出來。可是她還盡往好處想。跑往一些親戚、朋友、鄰近的家庭中打聽，都沒有下落。祖母和她，還有妹妹、弟弟們急得團團轉，祖孫哭在一起。

半夜，父親回來了，阿琴撲過去，叫道：

“玲玲呢？你，你把玲玲賣給人了？”

“賣給人又怎樣？女兒是我的！我賣你都可以！”

阿琴真不相信會在自己的父親口中聽到這樣的話。在她腦海裏，母親的遺言又響起來了，使她心如刀割。

“爸爸，你，你怎樣對得起媽媽！怎樣對得起媽媽！”

全家人忍不住悲聲大放。可是被毒品麻痺了理智的父親，恍如泥雕木塑，不見不聞。

“告訴我！告訴我，玲玲在哪裏？多少錢我都要把她贖回來！”

父親閉口不說。到了天亮，阿琴像瘋了一樣，跑到街上去，到處找。她大叫：

“玲玲！玲玲！你在哪裏！你在哪裏！”

“玲玲！玲玲！……”

她找遍了荃灣、葵涌、再跑到九龍，再跑到香港。凡是街上有兩歲左右大的女孩，她都要走到前面看一看，希望是她的玲玲。

可是，帶給她的是無數次的失望。

再找下去也實在不是辦法，爲了衆多的弟妹，又只好帶着心靈上嚴重的創傷，回到工廠上工。工友們安慰她，勸解她。她哭着說：

“爸爸吸毒，大哥坐監。玲玲沒有了，我下面還有幾個弟妹，我怎能一個人養幾個人？”

在工友的幫助下，四妹阿雲也只好做工了，最初是到一家五金廠做包裝，三個月後，想辦法進了龍×紗廠。阿琴的警惕性提高了，她要把妹妹帶在身邊。妹妹本來不是細紗工人，所以阿琴除了看自己的機之外，還要幫妹妹看機，靠着同車間的工友支持，總算站住了腳。阿雲很懂事，很勤勞。兩姐妹出了糧，第一件事是買够全家吃的米。其他家用就十分困難了，一家人常只能用豉油撈飯。

冷靜下來，阿琴決定要找父親說清楚。她對父親說：“爸爸，不要再吸鴉片烟了吧，你可憐我，可憐全家。如果你還是不改，我也會走的，我也不理這個家啦！”

經過反覆、耐心的勸說，父親也有一些覺悟，自己去找人想辦法，用什麼“戒烟水”來戒鴉片；也不去“大檔”了，改去工廠做雜工。阿琴很高興，因為到底似乎看到了一些轉機。但是所謂“戒烟水”本來是代毒品，並非真的戒掉，同時壞朋友一直在影響他，只過了兩三個月，父親重新吸上了毒，而且不是鴉片，改吸更厲害的白粉。工不做了，又開始當、賣東西。阿琴兩姐妹出糧時，就截住要錢。她們堅決不給，他便像冤魂一樣纏住，全家日夜不寧。更可怕的，是有些“白粉友”對父親獻計，說阿琴的樣子長得不錯，可以賣出九龍做舞女。而被毒害到完全沒有理智的父親，也居然向女兒提出來了。

這是又一個打在阿琴頭上的焦雷。她想起了八妹玲玲被

賣掉，想到父親以前說過“我賣你都可以”，不禁渾身戰慄。她不但恐怕自己會被迫送進萬劫不復的火坑，而且更恐怕弟妹們以後不知會到達什麼地步。怎麼辦？怎麼辦？父親有可能串同“白粉友”把她強搶。

她有一個自小認識的男工友阿輝，爲人比較正派，兩人很要好。阿輝經常幫助他們，他的母親喜歡阿琴，阿琴的祖母也喜歡這個小伙子。大家一商量，認爲趕快結婚，有了頭主，父親就不敢隨便下手。於是，她和阿輝簡簡單單地結婚了。那年阿琴才十七歲。她實在不願意這麼早結婚，可是這似乎是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

結婚之後，兩口子再勸父親，說：

“你想想吸毒把我們的家庭害到什麼地步？你下決心戒了吧，不戒就不要回家了，何苦負累我們？”

父親再一次受到感動，叫女兒送他去石鼓洲戒毒。過了一段時期，果然戒掉，出來了，還到信×紗廠做工。情況又似乎有好轉。阿琴又哪裏想得到，所謂“戒毒所”並不是和這個社會隔絕的。它不過是這個充滿了罪惡，浸透着罪惡的社會上面的裝飾品！

僅僅過了七個月比較平靜的日子，大哥又從赤柱“刑滿”放出來了。這個是好事嗎？不，對阿琴一家是大壞事。

大哥自從第一次被捉到“教養所”起，坐牢已經成爲他生活的主要部份了。像他自己對阿琴所說：“我是監倉養大的。”在監倉，大哥學會的主要本領就是吸毒，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懂。儘管是坐在監倉裏，還有人上門，拿大哥的字條，要

阿琴付毒品費。這次放出來，一回家，就是吸毒。他們還有個單身一人沒家眷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叔叔，本來也是吸毒的。三個人走在一起，父親又重新吸白粉了。

叔叔表面上還安份一點，父親和大哥兩個人，輪流向阿琴、阿雲要錢，用小刀指着祖母搶家用，阿雲不給錢就打。家庭又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祖母七十歲了，看見這個情形，也嚷着要自殺。阿琴這時爲了弟妹，同阿輝商量：“我結婚也是爲了弟妹，現在這個樣子，怎樣能不管？”兩口子搬回去和弟妹住，要頂住父親和大哥的壓迫。

不久，大哥又因身上被搜出毒品，再判坐牢了。趁這個時機，兄弟姐妹用最大的耐性，再勸父親戒毒，他們說：

“你再不戒，我們只有和祖母全家搬走。我們也決不會再給錢你吸毒！”於是，父親第三次戒毒，二入石鼓洲，而且再戒了毒出來。

在這個時候，又一件慘劇發生了。

三弟阿和，在姐姐們的養育下，一九七三年九月，剛從小學畢業出來，已經十七歲了。他本來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沒有可能再讀書，阿琴托工友介紹他進了太×毛織廠保存部做工。車間的領班專門引誘工友賭錢，欺負阿和年輕不懂事，贏了錢就要，輸了錢不給，阿和出的糧都被這樣滾掉了。他和領班吵了一場，離開了太×，轉去南×紗廠當夜班。白天，到球場打球，和一班飛仔混上了。在飛仔的教唆下，阿和說做工辛苦，不再做工，一天到晚都在球場上，有時還不回家睡。阿琴發現了弟弟的變化，她很擔心，勸告過

他。九月十五日，阿和說有一個朋友結婚，成班飛仔去喝喜酒，喝完到其中一人的家（葵涌新區××座）過夜，不回家了。十六日一早，有個飛仔驚惶失措地來找阿琴，她剛開完夜班回來。

“阿和被斬傷了！”

阿琴嚇得魂飛魄散。也來不及問是什麼事情，連忙趕到現場，只見弟弟已經臥在血泊中，有人報了警，救護車來到，先送荃灣的公立診療所，因情況嚴重，立刻再送九龍的醫院。在救護車裏，阿琴傷心地照料着阿和。他流着淚，有氣無力地說：

“家姐，我沒有聽你的話……被人斬傷了……現在很暈……我會不會死？……”

“不要緊，你不要害怕！”阿琴抓住弟弟的手，極力安慰他，心裏像刀割一樣痛楚。但弟弟為什麼被斬呢？她了解之後才知道，這天凌晨，阿和同另外兩個飛仔睡在走廊的尼龍床上，正呼呼大睡，忽然從梯間湧上了二十多個飛仔，包圍了他們，把他們喝醒，不由分說，便用西瓜刀、磨尖的水喉鐵、鐵尺亂砍、亂打。阿和後腦中一水喉鐵，腦漿也流出來了，傷勢最重。後來追究之下，據說是那批飛仔認錯人。

阿和送到醫院，流血不止，抽筋，但神智還清醒，用求救的目光看着姐姐。阿琴暈去又醒過來，哭着求醫生：“醫生，你救救我的弟弟吧，他是無辜的，你救救他吧！……”

結果，捱到第二天，阿和死了。

阿琴天旋地轉，懷着滿腔怒火，在街上跌跌撞撞地走。為什麼，她這一家有如此深重的苦難？為什麼，不幸的事一

件又一件地接連而來？母親被折磨至死，大哥、父親、叔叔吸毒，三弟又被斬死？……難道是命中注定？難道是偶然發生？災難像一座又一座大山，把她壓得氣也透不過來！她想過自己不如死了算數，可是還有幾個弟妹啊！她有太多的悲痛，仇恨，可是找誰訴呢？街上到處都是人，但有誰會關心她？同情她？……她感到前途茫茫，走投無路。

走過了紡織染業職工總會荃灣分會的路口，她忽然想起了芳姐。

阿琴兩年前參加了紡織染工會，是同廠工友芳姐介紹的，芳姐對她很關心，她就憑這一點相信芳姐，做了會員，但一直很少上工會，對工會也缺乏認識。在彷惶無計之下，她想找芳姐，目的是希望有個人能够聽聽她的心中的苦。

她走上了工會，呆呆的站着。

“工友，你找誰？”工會工作人員親切地問她。

“我找芳姐。”

“哦，你找芳姐，她剛出去了，很快回來的，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那麼，你等等她吧！”工會裏的人見她表情呆滯，也覺得有點奇怪。

不久，芳姐回來了。看見了芳姐，阿琴奔到她身邊，摟着她，像見到最親最親的人一樣，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芳姐被嚇了一跳，工會的其他工友都走過來了。

“阿琴，什麼事？是病了？不舒服嗎？”

芳姐知道阿琴身體一直不好，常常鬧病，關心地問她。

她只是搖頭。

“那麼，到底是什麼事呢？說出來吧，大家一定會幫助你的！”

阿琴說不出話，事實上，她千頭萬緒，也不知從何說起。她只說了一句：

“你有沒有看報紙？”

大家都不知她說什麼？但知道事出有因，連忙把當天的報紙找來。上面有阿和被飛仔斬傷的消息。

“死了，他死了！”

工會終於了解了全部情況。大家對於自己的階級姐妹一家所受到的深重苦難，不禁為之震動。社會的腐蝕，這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集中在阿琴一家所表現出來的嚴重程度，實在難以想像。

工會工友陪同阿琴回家，安慰她們一家人，為阿和辦了喪事。阿琴很感動，她想不到工人的集體會給她這樣大的幫助，這樣溫暖的關懷，覺得工會比自己的親人還親。

但是，大哥又出獄了，弟弟之死，他不放在心上，還是要吸毒。父親本來已戒了幾十日，受到阿和死去的刺激，又有大兒子對他的影響，壞人又向他引誘，重新又食白粉。情況變本加厲。大哥向家人勒索不遂，要放火燒屋，把棉被都燒掉了，又偷了阿雲的手錶。幾天之內，情況不斷發生，一次比一次嚴重，兩姐妹日夜害怕。他們覺得這樣的日子不能再過下去了。有一天，父親又要從家裏搬東西去當，阿琴勸阻，他還蠻不講理，要趕走阿琴，說：“外嫁女無權管家裏

的事！”“我是一家之主，有權趕你走！”阿琴沒有被這一套孔孟之道的胡說嚇倒，她再也忍受不住，挺起胸來向父親——其實是向附托在父親身上的魔鬼——製造這一切毒害的罪惡社會進行鬥爭！

“是誰迫我十七歲結婚？是誰使我這樣年輕就要做媽媽？你說！我為什麼把孩子留給婆婆照顧，自己回家裏住？都是爲了弟妹，爲了一家！你說外嫁女沒有權管你，我說：外嫁女就有權管！要搬出去的不是我，是你！”

父親在義正詞嚴的女兒面前，不得不低下頭去。他蜷縮在一旁，兇不起來了。看起來，他並不是沒有愧悔的，可是在這個毒化了的社會裏，他又被毒品腐蝕得那麼深，毒癖是最兇惡的魔鬼，把他緊緊抓住不放！儘管一時稍爲清醒，毒癖一發作，他便成了一個只求有錢吸毒，便不顧一切的人。阿琴幾姐弟和祖母沒有一分鐘不提心吊胆。

六月的一個早上，阿琴和阿雲開完夜班，兩姐妹心力交疲，也不想回家，坐在路旁，兩個人都很傷心，覺得前路茫茫，難以設想。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上工會！”阿琴腦子一亮，想起來了。工會在阿和死的時候給她一家的親切關懷和有力支持，使她知道只有工人的集體最可信賴。她站起來，把還有些猶疑的妹妹拉着，一起上紡織染荃灣支會。

工會的工作人員詳細了解了情況，爲她們作出分析，指出一切苦難的根源在於吃人的社會制度。工人受腐蝕，是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又一種表現出來的形式。父親、大哥固

然害了全家，但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冤有頭，債有主，不能只怪他們。只要有一點可能，還要盡力去挽救他們。

在工會啓發之下，阿琴兩姐妹由工友們陪同一起回家，鼓起勇氣，對父親和大哥再進行教育。

可是這受毒太深的兩父子，已經麻木得什麼也聽不進。他倆和工友們對他們勸了半天，毫無反應。說到最後，伸出手來還是要錢。

工會研究了這個情況，覺得這兩父子的改變，即使存在着可能性，也不是短期可見的事情。如何不讓慘劇再發生在這個不幸的家庭裏，是首先要做的事。根據阿琴姐妹和祖母的要求，工會協助她們另外找了個住的地方，附近有好的工友照顧，同父親、大哥分開生活，並對他們聲明：除非徹底戒毒，才再作考慮，否則不准他們再來騷擾！

從搬出來這一天開始，阿琴才感覺到是在這場十多年的噩夢中脫離出來。更重要的是，她開始懂得：雖然自己一家是那麼痛苦，但痛苦的決不是一家；苦難的根源也不在家庭之內，而是在社會的本質。因此過去以爲只要自己拼命地憑個人的“奮鬥”便可以改變自己的家庭狀況的想法，是錯誤的。自己一家的苦難，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苦大衆苦難的反映。不團結起來，共同戰鬥，取得勞苦大衆的解放，自己一家要真正從苦難中解放出來是不可能的。從這時開始，兩姐妹緊緊地依靠工會，把工會當成自己的家，阿雲以前對工會沒有認識，當時姐姐把她拉上工會時還有猶疑，現在她每天不上一次工會，心裏就不舒服。阿琴在她做工的信×廠

做了工會代表。

九月，信×廠老闆爲了轉嫁危機給工人，要減工人的升工（原來老闆爲了刺激工人生產，故意把工資定得很低，如果工人不請假，到出糧時早班多發兩天的工資，叫兩個升工；中班夜班有四個升工）。工人十分不滿，可是這個廠的會員很少，代表也就是阿琴一個。應該怎樣做？她現在對工人集體利益非常關心，但不大懂得如何對待這個問題。她立刻跑回工會報告情況，研究處理的辦法。

工會研究之後，提議她們開工友大會討論，指出有關全體工友利益的事情，只能由工友們自己決定。阿琴同意了。她在工會印了開會的通知書，請工友們第二天都來開會。時間很緊迫，而全廠有七百人。兩姐妹飛奔回廠，發動一些工友協助，星夜派發，告訴工友開會的事。一晚之間，除了有些工友接觸不到之外，她們頂住了廠方的召警恐嚇，共發了五百張通知書。

第二天，工友紛紛來開會。把一個會場塞得滿滿的，大家情緒高漲，鬥志昂揚。

“阿琴，你是代表，你主持開會吧！”工會負責人把她帶到講台上。

阿琴忽然熱淚奔流，喉頭哽咽，好一會說不出話。她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不是由於傷心而下淚。她是因爲看到工人集體的力量，看到工友的團結，看到自己在工人鬥爭中竟然能够起了一點作用，她怎能不激動呢！她再也不覺得自己的孤單，再也不覺得自己只是被欺負得透不過氣來。深仇大

恨，化成了勇氣和力量！

在工會的正確領導下，阿琴姐妹和全廠工友們團結在一起，進行了維護工人利益的說理鬥爭，取得了勝利。一大批工友更緊密地團結在工會周圍。

在發展會員的工作中，她耐心細緻地向工友動員，講工會的歷史，講工會在工人團結鬥爭中的作用。她說：“工人一定要團結，團結才能有力量，團結將來才有好日子！”爲了團結工友，她主動地把早班職位讓給工友，自己做長夜班，看到她的進步，工友們都很高興。

阿琴的一家苦難深重，工友凡是知道的，都覺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廣大同胞、勞動人民被黃、賭、毒、飛壓迫得太慘了！香港四百萬同胞中，難道只有這麼一家嗎？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多少人家散人亡？這些殺人不見血的屠刀，這些把人變成鬼的毒藥，是受害工人、同胞的附骨之疽。每一年，過十萬的“道友”（受害者還要被冠以這種侮辱的稱呼）被剝削了數以億計的血汗財富，還變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每一年，數以千計的少女“失蹤”，淪落在色情陷阱，成爲惡勢力的“搖錢樹”，斷送了青春，斷送了一生。

阿琴說，她做童工的時候有三個好朋友，現在兩個做了吧女，一個十五歲便做了小媽媽，可見情況的嚴重。每一年，多少人沉迷在賭博中，輸去了薪金、工資，輸掉了家庭僅有的生活費，甚至輸急了鋌而走險，在損人利己的思想主使下幹出了身敗名裂的事。每一年，多少青少年被“踢”入黑社會，被拉進“飛羣”，被迫參與打架、勒索、搶劫，成爲使

親者痛，仇者快的流氓。一九七四年只是兇殺案，便達到一百零一宗，被截劫行兇致傷的更不計其數，真是觸目驚心，人人自危。

這些極端惡劣的情況到底是怎樣造成的？

就以賭來說吧，香港最大的公開賭博公司就是“賽馬會”。它除了在所謂“馬季”中要每星期在馬場裏有一次到兩次的場內賭博，和一年有三次的發行“馬票”之外，最近還在港九新界各地遍設“場外投注站”，搞出許多名堂，使人們不到馬場去也一樣可以賭博。不久之後，還要在新界沙田開設第二個馬場，不斷擴大和發展這種“事業”。當局從這種“事業”裏獲得龐大的進賬。當局還搞什麼“多重彩”。在這樣的大力“提倡”下，香港實際上變成一個賭城。“字花”、“大檔”、“外圍狗、馬”，遍佈勞動人民居住的大街小巷。它們是緊緊附在勞動人民身上的吸血鬼。在一些工廠，例如英資經營的太古、黃埔兩個船塢，竟然縱容判工頭在工場裏開賭，引誘工人賭博，使不少工人輸光工資，還欠下一身的債，被縛住替老闆做牛做馬。類似的情形，在建築地盤和某些洋船裏，也早已成爲“風氣”，毒害着建築工人和海員工人。賭博不但殘酷地剝奪了工人的血汗錢和生活費，而且播散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的腐朽意識，破壞工人的團結。

知道一些歷史事實的人，都不會忘記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從那個時期的前後，開始了香港毒潮泛濫的慘痛歷史。誰都知道，到底是誰使毒品能够大批大批運進香港，是誰包庇着大大小小遍佈各處的毒窟！隨着腐朽思想和糜爛生

活方式的影響，近年來吸食者數量大增。在估計十萬人以上的吸食者之中，包括了各個階層，甚至有年僅十歲的小學生，在毒癮的摧殘下，許多家庭被拆散，妻子不認丈夫，父母不管兒女，男的吸食者什麼事都可以幹出來，女的往往因而淪為妓女，被蹂躪，壓榨至死。阿琴這一家就是被毒品引致家散人亡的例子之一。

黃色的浪潮，飛羣為禍，它們的根源都是來自萬惡的不合理社會！

但是，勞動人民是不會在這些陰險、毒辣、兇殘的毒害下屈服的。無數悲痛的事例，教育了廣大的工人，進一步看清楚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認識了階級敵人的惡毒，通過許多身受其害的人的血淚控訴，香港勞動人民激起了日益強烈的義憤，大家更加團結起來，懷着無比的仇恨，誓要為徹底消滅這些罪惡及其社會根源而奮鬥到底！

多 技 難 傍 身

紡織工人 卓 琪

工會會所裏，“慰問失業工友大會”正在進行。一個個工友，都以親身的經歷，訴說了在失業的威脅下，瀕臨飢餓的邊緣的痛苦。聽着工友們悲慘的遭遇，祥哥他再也按捺不住了，霍地站到台前，悲憤地控訴：“是誰使我們失業？是誰吃掉了我的左手！”他把左手高舉起來，整個手掌赫然沒有了！

窮苦的人家，都有一本血淚賬，祥哥的遭遇，使整個會場都震動了，大家彷彿看到祥哥高舉起的，是鮮血淋淋的手。“是誰吃掉你珍貴的左手？說吧，祥哥！”大家都深情地望着祥哥。就在一片肅穆的氣氛中，祥哥憤怒地進行了控訴！講述了他的悲慘遭遇。

我從小就出來做工了，而且我還幹過了許多行，像茶樓、製衣廠打紐門、紗廠、燒焊、搬運，很多行業都幹過。那時，我剛結婚不久，家裏還有老父老母。爲了養活一家，我十分勤奮地工作。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兩餐總會溫飽的。所以，我學會多種技能，一行淡了，我就馬上能轉

行，這樣總不致坐以待斃吧！

但是，在這個社會裏，勤儉未必可以養家，多技也未能傍身。在西方經濟危機打擊下，香港各行業都普遍出現了歷年罕見的淡風，我所幹的各個行業，都是做不了幾天，就要停工。面對這種困境，真使我一籌莫展。失業了幾個月，正是“穀種”都已經吃光了。這時，紗廠還有些工開，我便千方百計托人介紹，重回到紗廠工作。

當我重回紗廠的第一天，就聽到了清花間鬧鬼的消息了。領班都繪影繪聲地傳說，說什麼鬼氣重啦，所以這車間近來連續發生傷人事件，說得鬼氣森森的。聽工友說，前幾天，大領班的老婆還特地帶來了香燭，煞有介事地祭鬼一番呢！

我當時就是被安排在清花間工作。我對鬼神是不大畏忌的，不過我倒看出這個車間是與往不同了。我記得，我離開這間紗廠到外邊工作，才不過兩三年的光景，現在車間却多了一批批新簇簇的機器，以前的那些舊機器，現在連影兒也沒有。廠的發展真快，整間紗廠的規模確是越來越大了！

現在車間的那副新機器，機長幾十呎，速度比以前的快得多了。在這裏開工，應該要兩人一起工作才合理，一人在機前撕開棉紗，放入機內，另一人在機尾取出棉紗。但現在却規定只要一個人來做，廠方甚至還說什麼“現在經濟不景，勞資合作，共度難關。”這樣就要由我一人做兩人工，整日在車間裏兩邊走，疲於奔命，真不是件輕易的工作啊！但想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這份工作，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來幹。

幹下來，這份工作果然不易捱。這邊機前落棉紗，要用手

把棉紗撕開才能放入機內；另一處却要在機尾把棉紗取出來，平均幾分鐘就要清理機尾一次。這樣整日不停地撕，不停地取棉紗，來回奔跑，放工時，手和腿都痠痛不堪。手掌痛得張不開來，我的右手以前在做燒焊時，因鋼架塌下而壓斷了一條筋，傷殘百分之二，一使勁來就十分疼痛，現在爲了生活却只好強忍。由於整日兩邊跑，跑得滿天星斗的，連抬起雙腿也無力了。老實說，我幹過了許多行業，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再做紗廠時會這樣辛苦的，一人做兩人工的苦處，可真不易捱啊！但是，想起了一家的生活，想起了妻子將要臨盆，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強捱下去。

這樣過了幾個月，廠方顯然對我的工作很滿意，經常誇獎我，我想這份工大概已穩定了。

有一次，我患上了感冒，在家休息了幾天，就帶着藥片上工了。工友一瞧我的臉色，知道我的病還未好，十分關心我，勸我多休息一兩天。

但是，我却只能婉却了工友們的好意。是的，我的病還沒有痊癒，我的四肢還酸軟乏力，脚步浮浮，我也是多麼想再休息一兩天啊！但這些天來，領班都頻頻地來催促我開工，我在電話筒裏，就可以想像得到大領班暴跳的樣子，說什麼我停了工，下面部門工友便無法開工了；甚至暗示我的職位會有問題。這樣，我還有什麼選擇呢？

開工了，我只好把病痛暫時擱在一邊，被迫進行了極其緊張的勞動。才捱得了個多鐘頭，就感到機器越轉越快，人也不由自主地隨着機器速度而奔跑，跑得我天旋地轉的。吃

過了幾片藥片，振作一下精神，我又繼續捲下去。湊巧這天機器經常被棉紗塞住，要打開機器清理。這時，機器又停住了。我知道，棉紗又在機器中給塞住了。我定了定神，按照正常工作步驟，首先關了機器，然後打開了機器的蓋子，把左手伸進去，準備把棉紗取出來。就在這個時候，我一眼看到了原來機內的車葉還未停定，正急促地打過來。我急忙縮手，但已太遲了，一陣劇痛，痛入心脾；伸出手來，只見血淋淋的，整個手掌都沒有了！我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那靈巧的手沒有了！我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救傷車來了，要把我抬走。這時我還很清醒，我知道我的手已經完了，沒有了手，今後怎麼能工作？今後一家生活怎辦？還有妻子即將臨盆，……一連串的問號，逼着而來，我強忍着痛苦，當將被抬上救傷車之前，一把抓住了大領班，說：“大領班，現在我傷殘了，廠方會照顧我嗎？”

大領班環顧了圍在一起的工人一眼，然後才笑呵呵地說：“亞祥，你放心好了，你是因工受傷的，廠方總會照顧你的。”

我聽後，心裏也釋然了。救傷人員急忙把我抬上車，一陣刺耳的急響，救傷車絕塵而去了。

我是滿懷着希望回到紗廠的。經過三個月的醫治，我的傷勢大致復原了。住院期間，工友們經常來探望，並且湊了千多元，讓我買了一隻很靈活的假手。有了這隻假手，可以幫助我做很多工作，稍為彌補一下殘手的缺陷了。工友們對我這樣關心，我非常感激。同時，曾有幾個領班來探望

我，我當時很着急地追問了我的職位問題。因住院以來，一家生活無着，已經欠下人家一身債了。當時領班這樣說：“聽說廠方準備給責任工你做。就是做領班、指導工之類，行行企企，你會做得來的。”

現在，我返廠了。大領班一見我，滿口關心地問：“唉，你這麼快便返來了，怎麼不多休息幾天？”

“大領班，我一家等我吃飯，打工仔，手停口停。反正現在傷勢好多了，就讓我早日返工吧。廠方準備給份什麼工我做？”

大領班遲疑了好一會，才說：“現在廠方沒有準備，你過多一星期再來吧。”

幾個月了，廠方一直在拖，我的希望成了泡影。我清晰地記得，自己在上救傷車之前，廠方滿口承諾，說無論如何會照顧我的。但現在追了幾個月，仍未有下文。眼看工傷賠償的萬多元，已是坐吃山空了，孩子又在這個時候出世，職業仍然無着，這怎不令我心焦啊！最後，我嚴正地質問廠方，要廠方拿出誠意來。

廠方負責人這時才慢吞吞地說：“本來呢，你是因工受傷，應該給回你一份工作，但你的手已經殘廢，其他工作做不來，現在領班又沒有空位，沒有理由除人用你呀？”

“我知道揸電梯缺一個位，我雖然左手殘廢了，但仍可以做得來。”

“這個讓我考慮一下吧。”

“不用考慮了，說穿了還是要拖。用還是不用，你直截

地說。”

“你要知道，這間廠有很多股東，用人，我不能包辦呀！”

“你是廠方的負責人，怎會連用一個人也没有權？”

“你不相信，我也没有辦法。”

“掃地雜工總可以吧。”

廠方負責人聳聳肩，表示無能為力。

事實很明顯，廠方一直在拖，一直在敷衍着我。現在職業是無望了，今後一家生活怎辦呢？多月來，我東奔西走，希望找到一份職業，但是眼前到處鬧失業，其他人尚且找不到工作，我現在殘廢了，誰會用我呢？我曾到過勞工處質問，但勞工處的官員却說：“廠方已給了你勞工賠償，已經很合法了，至於廠方今後繼續用你與否，我們也是無權過問的！”

這是什麼話？難道我的手只值萬多元？是誰要我一人做兩人工作？難道我的手因工殘廢了，廠方除了發那區區的賠償費，就完全沒有責任了嗎？

正在我彷徨無計的時候，工友們都來關心我，還帶我上工會，讓我參加了集體生活。我和大家工友，原來彼此不相識，他們這樣關心我，並且幫助我解決許多困難，使我十分感動，工友們說，“我們工人階級是一家人，應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才對。”工友並且帶我一起探訪失業工友，慰問失業貧苦工人家庭，幫助我認識不少問題，使我進一步認清苦難的根源。工友還告訴我，自我工傷以來，又有六、七個工友受傷了，現在大領班的老婆經常要“祭鬼”了。

“祭鬼”就能解決問題嗎？我知道得很清楚，廠方是利用

失業嚴重，乘機落井下石，加強我們工人勞動強度，不顧我們工作安全，才接二連三地造成了工傷事故。到底誰在搗鬼？就是資本家這隻吸血鬼。

現在我在集體的關懷下，解決了職業的問題。資本家吃掉了我一隻手，工友大家關心，給回我另外一隻。這隻手，是工友大家給的，今後我更要好好地為工友們服務！

苦難的青衣塘

搪瓷工人 華 強

在青衣島的南面，獅頭山腳下的海灣，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簡陋破爛的棚屋。幾十條板橋架在水面，把那一間間的棚屋連接起來。只見那一堆堆的垃圾，那腐爛得差點認不出來的死魚、死螺、死鷄、死貓、死狗、死老鼠，加上人的糞便堆積在水上，臭氣薰天。

烈日之下，只有六呎高的棚頂晒得發燙，可以想像得到屋裏就像焗爐一樣。偶然吹來一陣風，會是涼快些，可是，總夾雜着一陣腥臭味。東面牛皮廠的臭氣，南面開山地盆的沙塵，西面涌尾村流下來的豬屎、垃圾，北面搪瓷廠的化學硝酸氣也隨時會順着風向刮過來，成年人也經常被嗆得眼水鼻涕一齊流，年幼的小孩更是哭哭啼啼，難以忍受。

這就是與荃灣一水之隔的青衣塘，有誰會想到在這樣的海灣竟聚居着三千多貧苦的工人和漁民呢？

在這裏居住的都是歷盡滄桑的勞動人民。他們原來大多數是漁民，散居於香港九龍各處海灣，如香港仔、九龍灣、旺角、荃灣、北角、筲箕灣、長沙灣等各處。由於不斷的填

海賣地，他們就被趕到這裏來。塘上的棚戶越住越多，人口也不斷增加。人們大多在岸上做工，以低廉的工資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一九七四年以來，由於香港經濟衰退，工廠停工減產，居住在這個塘上的人家又增添了一重苦難。

張伯是青衣塘千百戶貧苦居民中的一戶，他今年六十三歲了，整天不分晝夜地坐在昏暗的屋裏，手拿着膠花，放到眼皮底下穿着。很久才穿好一塊，實在看不到了、疲倦了，才挪動一下坐的位置，又繼續埋頭穿着。這些天到工廠取膠花來做，廠方總說工廠無訂單，白走了幾次，好不容易昨天等了一朝才收回那麼一些，如果不手快些，收發先生又說耽誤了他的工夫了。

張嬸也是五十過外的人了，她藉着外面射進來的日光，默默的點數目，一粒一粒地穿着珠仔，這天中午趕着要交貨，昨晚到現在還未有合上過眼睛。

夫婦倆就是這樣整天整夜地穿着這些膠花和珠仔，好不容易才得一元幾角過活，還要供養老母親呢！

張伯的老母親已經九十多歲了，行動不便，耳朵又聾，整天捲曲着身體睡在暗暗的角落裏，躺倦了，就坐起來，一會兒又再躺下；只有吃飯時才挪出床口，用顫抖着的雙手，捧着飯碗，艱辛地扒吃着。

這三個老人就是這樣默默地過着淒慘的晚年。

張伯原本是個漁民，靠捕魚為生。本來有五個兒子，現在僅剩下兩個。大的已經結婚了，還養了三個孩子。小的是塑膠工人。原來的二兒子，因為張嬸營養不足，他剛出娘胎

就夭折了，四兒子和五兒子是遇上颱風給浸死的。

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深秋，張伯的船灣在長洲海面，那天，只有婆婆一個上了岸，張伯、張嬸和四個兒子都在船上。到凌晨四點鐘左右，海面刮起大風，他們睡得正熟，突然一震，船身一抖，張伯一扎醒，小船已經給打翻了，船上的雜物和被舖全都掉到海裏去，四兒子和五兒子也給拋了出去，大兒子和三兒子拚命的游過來。四兒子五歲，五兒子只得三歲，張伯搶過去想抓住他們，突然一個浪打過來，把他們捲去，張伯忙翻轉來，叫大兒子和三兒子翻轉小船，抓住船邊，他和張嬸死命的找尋年幼的兒子。張嬸不顧海水打進口裏，張開口拚命的叫：

“強仔，亞良……”

“亞良，強仔……”

夫婦倆叫着，找着，已經筋疲力盡了，還不見兩個小兒子的蹤影。就這樣兩個小小的生命結束了。

後來，他們一家被人救起，兩個小兒子却浮屍海面。他們悲痛欲絕，呼天搶地，剩下的兩個兒子也哭作一團。船沒有了，財物失去了，家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以後怎麼辦呢？婆婆在岸上住的棚屋很細，不够他們住，他們晚上只得睡街邊。為了生活，張嬸含着眼淚領着兩個孩子上長洲街頭乞食，還要乞些回來，供養婆婆。以後他們就過着行乞度日的生活了。

初時，他們還幸好遇到一家晒蝦醬的幾個工人，這幾個工人很同情他們的遭遇，常常送些魚仔和冷飯給他們回去煲

粥，有時還特意煮多點飯，好多剩些冷飯給他們，但畢竟這幾個工人自己的生活也不好過，長期這樣也不是辦法。張嬸有時同丈夫講：“你也出去走走，多擺點飯回來啦！”

“餓死我也不去，不去，不去！”

張伯嚎叫着。他想到自己本來可以靠擺魚勉強養活一家，現在船沒有了，又找不到別的工作，要出來行乞度日，他心裏會多難受呢！

張嬸又只得領着兩個孩子，逐條街逐條街的走。有時一天可以乞到二、三元；有時遇上有錢人家的頑皮仔，錢乞不到，兒子乞飯的破碗還被搶去摔在地，兩個兒子憤憤不平想和人家打起來，張嬸只得按着兒子，叫他們不要惹事，又含着眼淚，一把飯一把沙的把摔落在地上的飯撿回來；有時又被有錢人家的狗追趕，褲腳也被扯爛。這樣子的行乞生活，受盡了多少屈辱和折磨！

到了一九六四年，他們從長洲乞到北角，從北角又乞到長沙灣，已經轉過幾個地方了。後來，張伯也取點膠花回來穿，每天賺一元幾角，總算有點收入。這時，大兒子和二兒子也有十多歲了，他們央求着張嬸：

“媽媽，我不做乞兒仔！”

“媽媽，我不如去做工，不去乞了！”

這樣，兩個兒子就去當學徒，賺餐吃的，自己養活自己。張伯一家這才結束了足有八年長的行乞生活。

幾年過去了，兩個兒子死慳死抵，積蓄了些零用錢，張伯再到處張羅一些錢，修了隻破船，駛來青衣塘，從此就在

這裏棲身了。一年又一年過去，風吹雨打，船實在破得不能再修了，張伯就在船旁蓋個矮小的棚架，兒子和婆婆睡在棚屋裏，夫婦倆晚上則鑽進破船裏去睡。

這時候，張伯和妻子得人家介紹，到了工廠做工，由婆婆看家。晃眼又過了幾年，本以為可以安安定定度過晚年，怎知在一九六八年，張伯雙眼突然失明，張嬸患風濕腰痛，又要照顧婆婆和丈夫，不能出外工作了。生活的重擔便全部放在兩個兒子肩上。

窮人的苦難，好像總沒有盡頭，大兒子前幾年結婚了，在毛衫廠開工，但經常不够工開，近來開工足了，工資却被壓低了一大截，要養三個孩子，已經不容易了。二兒子做塑膠啤工，但自一九七四年以來經常沒有工開，除自己食用外也已所剩無幾。剩下三個老人在家，生活真難熬呀！

近年來，張伯雙眼總算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一點東西，於是取些膠花回來穿，但也要拿到眼皮底下才穿得到。張嬸穿珠仔，每天賺一元幾角買些米，有時鄰居的孩子在海裏摸到了鰻，也分點給張伯做餸，二兒子有工開時，也拿一點錢回來。這樣勉強熬過去。

張伯苦思冥想，不禁老淚縱橫。八年行乞的日子已經够苦了，難道這晚年還要靠行乞度過嗎？

“張伯，張嬸，很大的蟹呀！”

這一天，鄰居的孩子邊喊邊跑進屋來，打斷了張伯的思路。張伯急忙用衣袖擦擦眼睛。

“張伯，給你。”

孩子遞過來一小罐蟹。

“你拿回家煮飯去，你媽就回來呀！”張伯說。

“不，這是給你的。今天我摸了很多很多呀！”

鄰居的孩子說着，望望張伯，發覺他眼睛也紅了。

“張伯，你哭呀？”

“沒……沒有，你媽等你回去呢，我就留着這罐蟹，你快回去吧。”

“不，我媽和爸要八點才收工回來的。張伯，你不要哭，我來幫你。”

說着，孩子就坐在地上幫着穿膠花。

張伯望着這個鄰居的孩子。他多懂事啊！才不過十一、二歲的孩子本來是無憂無慮的，但他却飽嘗了不少苦頭，記得去年他爸爸工傷，媽媽正生第三弟弟時，家裏的錢都給爸爸治傷花光了，窮得鍋蓋也揭不開。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樣，幾歲大就要上街乞食，被一些頑皮仔在後面追趕、擲石頭，光着腳板走破了一道血口子又一道血口子，有時他在門口走過，自己實在心痛，就叫他進來，滿屋的找點東西給他吃。

張伯越想心裏越難過，難道我們住在這裏的人家就註定要吃苦的嗎？這裏還有多少苦難的人家呢？

張伯像是質問蒼天，憤憤不平。

踏上了另一條橋板，人們會經常地看到棚屋前有三個不足十歲的孩子在玩耍，在狹窄的橋板上，撫弄着一個濕漉漉的沾滿污泥的破膠球，看上去還是剛剛從塘裏的垃圾堆撿上

來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手執着一枝短棍蹲在門前看着他們。細看下，她目光呆滯，衣着還算整齊，只是一會兒哭喪着臉，一會兒又用手中的棍在空間指劃着。走前去，屋內矮床上還坐着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人，口中唸唸有詞，頭髮蓬亂，不時胡亂抓着床上的衣物被舖。這便是堯哥夫婦了。

堯哥本來是做建築的，日間開工，堯嫂便在家照顧孩子，辛辛苦苦的生活總算過得去。但是，長期來工作操勞，居住在上燭下燼的住所裏，堯哥身體越來越差了。打工仔手停口停，自己不食孩子們都要食，“得閑死唔得閑病”唯有死捱。終於，堯哥突然發高燒，送進醫院幾天了，還是昏昏迷迷的。堯嫂整天奔波，憂心忡忡。這一天，堯嫂準備出門去探望堯哥，拿起銀包，打開一看，僅剩下幾元，她再回轉身，在床頭的木架上翻着，平時放錢的盒裏也只剩下三十元了，她捧着這個盒在發呆。

“這個月的開支怎辦呢？堯哥幾時才可出院呢？萬一不幸，三個孩子的日子怎樣過呢？”

一連串的問號在堯嫂腦中縈繞，就這樣，堯哥還沒有病癒，堯嫂就苦想成癡了。

堯哥病癒出院，身體更加虛弱，加上看見妻子瘋瘋癲癲的，精神上更是大受打擊，思前想後，沒幾天也跟着癡了。

這天，夫妻倆同時病發，相對着哭哭鬧鬧的，嚇得孩子們也哭叫起來。鄰居見孩子們怪可憐的，就叫他們出門口玩，孩子們才安定下來。這天他們就沒有東西吃，又沒人照顧，滿臉污泥的；餓了，也不管吃得吃不得，抓到東西就往嘴裏

塞。大人受苦，孩子也要受苦。堯哥的幾個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過着野孩子般的生活。

還有漫長的歲月，堯哥一家又怎樣過呢？然而再走過第二、第四、第五……條橋板，還有多少貧苦大眾在苦難中掙扎呵！

青衣塘——這個小小的海灣，浸滿着貧苦勞動人民血淚的海灣。聽說爲了配合什麼發展計劃，青衣塘將要被填平。那麼，在這裏掙扎着的貧苦人家又將面臨怎樣的遭遇呢？他們又會被趕到哪裏去呢？

在“華麗”的酒店裏

洋務工人 何祥

夕陽西下，彩霞萬道，夜幕徐徐降臨。花園道上、銅鑼灣畔、九龍半島之濱，一幢幢高聳巍峨的大酒店，耀眼的燈光，閃閃生輝，儼如白晝，艷麗堂皇。通宵達旦，遊客和“高貴”的仕女們穿梭其間。

瑰麗堂皇的外表，却掩蓋着無數的不平和不幸；這裏充滿着酒店工人的辛酸和憤慨！

堅伯，是我們酒店這一行資歷較深的“老行尊”，已經五十多歲了，身體還算健壯，但雙腳有些畸形，背有些彎曲，這是長期辛勞、長期站立的結果呀。由於他還有可以利用的廉價勞力，老闆還是繼續僱用他。其實堅伯並不老，只是經歷“老”。自從十四歲開始，他就踏入酒店這一行業，由門口小童到行李部、餐廳部，直至現在還擔任着的房口部。雖然天天上工，都是“腳踏地毯，頭頂冷氣”，但身受的壓迫和剝削就不勝枚舉了；更有甚者是精神的虐待、人身的侮辱。

一樁不尋常的事件發生在堅伯身上。事情是這樣的：

傍晚時分，堅伯交班回家，經過一天工作的疲勞，正躺

在床上打瞌睡休息，突然有人敲門，門剛開，幾個大漢湧了進來。

“你是亞堅嗎？”其中一個大漢問。

“找我什麼事呢？”堅伯認得其中一個是常來酒店的雜差。

“當然有事，快些穿衣跟我們返差館！”

堅伯只得硬着頭皮，穿好衣服，吩咐了家人，就跟那班人到差館去。一到差館，他就被帶進一間設備簡陋的房間。剛在一張椅子坐下，幾個大漢一窩蜂圍上來，用質問的語氣威嚇說：

“快些把東西拿回來！”“交出來就沒事！”“是否要‘趙’一身至肯認？！”你一言我一語，使堅伯更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原來，住在他那層樓的一位洋太太失了鑽石戒子，報案後，警方查出是堅伯當更的，於是咬死是堅伯偷去了，馬上派人去拉堅伯，企圖迫他交出那隻鑽石戒子。可是，堅伯確實沒有取去，又怎能招認？怎能交出鑽戒呢？

大漢們輪番地進行盤問，有的說好，有的說歹，無非是要堅伯食了這隻“死貓”，但堅伯決不承認。直至深夜，大漢們見不能再逼出什麼了，才放堅伯回家，但聲言隨時會找他盤問的。

堅伯非常氣憤，難道客人失了物件，一定是我們工人取去的嗎？！

後來，那洋太太報說已在地毯縫隙找回鑽戒了，她只說了一聲“對不起”就算了事，但堅伯却受了多少精神上的威嚇

和人身的侮辱啊！

客人失落東西，酒店工人就是第一個被懷疑，被視為盜賊；客人一報案，就被拉上差館，被盤問，被凌辱。過去，甚至遭毒打迫供，有的慘遭屈辱坐牢。這不是對酒店工人的人格污辱又是什麼？！我們酒店工人真是“一隻腳踏在酒店，一隻腳踏在差館門口”。

酒店工人不但受客人的氣、被誣告，還不時給資方無理責罵，甚至毆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一間在淺水灣畔歷史悠久的大酒店，有一天，那時正是炎熱的夏天，酒店的電燈房突然冒烟，一時秩序大亂，好在餐樓小工亞強仔醒目，馬上往樓下梯口取來滅火筒搶救，頃刻間把火煙撲滅了。那時，洋大班匆忙趕來，一眼看見地氈上滿是泡沫，再一眼看見強仔抱着滅火筒，不問情由，揪着強仔的工作服，大力推撞雙肩，並要強仔脫下。工人救火不但沒有得到嘉獎，反被指責弄污“名貴”的地氈，要把他開除，真是豈有此理！但更無理的是，當強仔正要辯說時，那洋大班已一巴掌打去，一個粗壯如牛的洋漢，把那個小工打得滾下樓梯受傷了。

不平則鳴，洋大班這種橫蠻無理的行為，在場的工友們個個睇到眼火爆，齊聲喝止。亞強沒有流淚，只有怒火在胸中燃燒。這事件引起工人和社會人士廣泛的不滿，在工友及工會的支持下，終於迫使這個毆打工人的俄籍洋大班“疴屎落褲”（工人是這樣說他的）向亞強道歉、賠償湯藥費，並保證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另一間美國資本的世界知名的大酒店，令人氣憤的事情

特別多。記得在開業初期，竟然設有名爲“烟格”的餐廳，說是“東方色彩”，吸引遊客，這是對東方民族的極大侮辱，立時引起港九有民族自尊心的同胞們羣起而攻之，終於迫使美國老闆改爲“鷹巢”。

但是，這樣的事情並沒有因此而終結。在“招徠客人”的幌子下，頻頻搞各種各樣的周，如法國周、意大利周、西班牙周、印尼周……，在這些什麼周期間，資方說爲了什麼配合氣氛，強迫我們工人穿上奇形怪狀的服飾。如法國周，要我們打扮成拿破崙時代的士兵；意大利周則要我們扮成海盜：紅色的小鬼帽，藍白間色的笠衫……古靈精怪，爲“高貴”仕女們倒酒、捧餐，把我們作爲佈景板。尤其是在冷氣機下，只穿如此單薄的笠衫，凍熬着軀體，不冷病才怪哩！王仔就是這樣給冷壞了，患上支氣管炎，醫好些了，又再受冷。疾病斷斷續續的纏繞着他，至今還未痊癒。

更令人氣憤的是，這間花園道上的大酒店，竟以色情招徠顧客。在頂樓的泳池，迫使女侍應生穿低胸上衣、短裙，而那裏的枱椅特別矮，這樣，當女侍應生端茶奉酒時，一俯一仰，以滿足那些“高貴”客人們的低級趣味。這是對我們工人，尤其是對女性的極大侮辱！

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政客，不是經常吹噓他們國家的“文明”，誇耀他們的“人權宣言”嗎？爲什麼就在這些“文明”的資本家開設的大酒店裏，竟是如此費盡心思地去侮辱人身，侮辱東方民族，侮辱女性？！

酒店工人反對穿着奇裝異服。在戰後初期，洋務工會領

導工人，與四大酒店資方進行談判鬥爭，取得了勝利，白紙黑字簽在協議書上，一直來工人都穿着白衫黑褲的工人制服。可是，該酒店資方躍躍欲試，企圖打破協議上的規定，但又心虛，偷偷摸摸地從外邊借來“長衫馬褂”，準備在某次達官貴人的大宴會上迫使工人穿着。但是這個陰謀被識穿了，工友得知後，非常火滾，馬上派出代表，大興問罪之師，質問資方還記得曾簽訂反對穿着奇裝異服的協定沒有？此時，資方自知事敗，推說“沒有此事，只是謠傳”。工友們的團結一心，反對奇裝異服，迫使資方把此事作罷。

酒店工人取得的每一個勝利，每前進一步，都經過了不懈的努力，不斷的進取。前輩的光榮鬥爭傳統將永遠不會磨滅。酒店工人兄弟，將會更加團結起來。

阿鳳的遭遇

五金工人 蘆明

“阿鳳！阿鳳！……你醒過來了！”

一羣女孩子圍在病床兩邊，緊張地望着床上躺着的病人，一個勁地叫着。躺在床上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尖尖的臉蛋，沒有一絲血色，只見她眼瞼緩緩地眨着，終於張開了，床邊的女孩子們不禁喜極而呼。整整七天七夜了，阿鳳終於醒過來了，她們七天七夜懸着的一顆心終於放下來了。

“伯母，伯母，阿鳳醒了！”

在病房的角落，一個約四十歲的婦人，正在洗手盆裏搓着毛巾，聽見叫聲，急急腳的奔過來，女孩子們忙讓開一條路，這個婦人迅速來到床邊。她就是阿鳳的媽媽。

“阿鳳！阿鳳！你醒醒吧！”

阿鳳再次張開眼，望了一下，但又很疲倦似的重新合上了。

這個叫阿鳳的是個年青的電子女工。一個星期前，她像往常一樣，天剛剛亮就起床，洗過臉，換了衣服，生怕弄醒

母親及弟妹，正輕輕地準備出門上工去，却聽到媽媽在叫着：

“阿鳳，在我錢包裏拿點錢買東西吃吧！”

“哦！”

阿鳳口裏應着，但却悄悄地出門去了。

回到工場，阿鳳如往常一樣，不言不語地坐在自己的工作位上，眼睛死盯着在自動生產線上的機件，手不停地動着。做着做着，為什麼雙手老是不聽使喚，老是追不上移動着的生產線上的機件？她想：今天的“拉”（自動生產線）好像是快了。

“喂！阿鳳！一定是老闆又作怪了，‘拉’越開越快了。”

那邊一個女孩子的叫聲傳了過來。

阿鳳轉過頭，張開嘴剛想答話，但機件又走過了，她只得又默不作聲地繼續死命地趕。

“阿英，我真頂不住了。”另一個女孩子對剛才叫嚷的女孩子說。

跟着幾個女孩子也在嚷哄開了。就在這個時候，阿鳳突然扒在生產線上，胸口壓着機件，暈過去了。

“哎唷！有人暈倒了！有人暈倒了！”

“是阿鳳呀！”

“阿鳳暈了！”

一班女孩子都圍了上來，那自動生產線還在飛快地移動着。

“你們為什麼不開工，回去！回去！”

一個管工模樣的男人走過來。

“有人暈了，還開工？開工，開個屁！”

女孩子們反駁着。

“暈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一會兒就醒來嘛！開工！”

管工找來幾個人把阿鳳抬到樓下，追着這班女孩子繼續開工。但是那個叫阿英的女工和另外兩個女孩子很不放心，還是跟着到樓下。

果然，廠方沒有送阿鳳去急救，阿英只得替阿鳳擦藥油，足有一個多鐘頭，阿鳳才醒轉過來，廠方怕事情鬧開去，影響趕貨，影響工廠的聲譽，就打電話叫阿鳳的母親來接阿鳳回家。怎知，還沒有踏進家門，阿鳳又再次暈過去了。嚇壞了鳳媽，急得手忙腳亂。後來，還是馬上把阿鳳送進了醫院。誰想到阿鳳一直昏迷了七天七夜呢！

“阿鳳！阿鳳！你怎麼啦？”

這時，鳳媽看見女兒終於醒過來，不知是喜是悲，她含着淚叫喊着。阿鳳又緩緩地張開眼，呆呆地望着媽媽，毫無反應。

“我是媽媽，是你媽媽，你認得嗎？”

阿鳳像是聽到，又像是沒有聽到，呆呆的，後來又閉上了眼睛。顯然這是受到了過分的疲勞折磨的結果。在昏迷之後，她記憶力喪失，什麼事情也記不起來了。

母親看着女兒，真是心如刀割。阿鳳自幼很懂事，不愛出聲。讀書時，一放學就回家，幫助媽媽照顧弟妹，做家務，洗衣服、煮飯……樣樣都做。小學畢業時，她僅得十二歲，本是應該繼續讓她讀書的，但丈夫收入少，阿鳳又是最

大的女兒，底下還有五個弟妹，鳳媽只得忍痛讓阿鳳到電子廠做工，幫助維持一家的生活。

阿鳳出來工作後，更加懂事了。放工就回家，出糧就把全部工資交給媽媽，自己只拿一些零用，從來也捨不得多花一個錢。做媽媽的就更加疼愛這個女兒了。鳳媽萬萬想不到女兒會被折磨成這個樣子。一旦女兒不能恢復正常，鳳媽心裏要有多大的難受啊？如果女兒不能再上工，一家人的生活更成問題了。想着，想着，止不住的淚水在鳳媽的臉上不停的淌着。

工友們非常關心阿鳳的安危，紛紛來探望；阿鳳的弟妹們也從人叢中擠了上來。有人提議找她最關心的事物來引導她恢復記憶力。大家嘗試了多次，但阿鳳仍然沒有反應。大家費盡了心思，想起了阿鳳在生產線上工作必須用到的一塊小木頭，立即拿了來試試。當阿鳳見到這塊與她每天從早到晚相對的，這象徵着資方對她壓榨的小木頭，震動了一下，跟着緊緊地抓住這塊木頭，喃喃地說：

“這是我的，是我開工用的。”

阿鳳眼眶裏閃着淚珠，開始有些記憶了。

幾年來，天天機械的、沉重的操作，使阿鳳腦子裏牽掛着的就是開工，就是開工用的木頭。是可憐呢？還是可恨呢？站在床沿的工友們緊握雙拳，緊咬自己的牙齒，眼睛模糊了，滾滾的熱淚奪眶而出，訴說着不合理社會的罪惡，燃燒着對資方不顧工人死活的怒火，流露出對工友深切關懷的情誼。

良久，阿英打破了沉默，摸着阿鳳的臉兒，問道：

“阿鳳，我是坐在你隔三個位的阿英，你認得嗎？”

“嗯！”

“我是你隔鄰位的阿蘭呀！”

“嗯！”

“我是阿娟呀！”

“唔！”

慢慢地阿鳳隱隱約約地記起了工廠裏每天一起工作的工友們了。

“阿鳳，我是媽媽呀！她是阿妹呀！他是小弟呀！”

“嘩！”的一聲，阿鳳抱着媽媽哭起來了。

阿鳳算是恢復了記憶，但還不能工作，還經常暈眩，只得在家休息。

一個多月後，阿鳳回工廠去想繼續開工，怎知老闆藉口阿鳳身體還未復原，需要多休息，叫阿鳳回家。就這樣毫無補償地將阿鳳一脚踢走，變相開除了。

阿鳳感到茫然。她從自己曾經四年來天天晨早趕來打工咁，晚晚拖着疲乏的脚步離開的工廠門口走出來，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踱着。她不禁想起了當初進廠時，老闆講過的話：

“你身爲本公司的一分子，我們深以爲榮，並希望你能與我們一起長期共處，爲達成新的目標而努力。”

多好聽的花言巧語！現在，老闆賺了大錢，工人也增加了，廠是越開越大，老闆的胃口也是越來越大，而我們工人呢？爲了飯碗，被老闆那永無止境的“新目標”逼着，“加機”

(增加工作標準數)、“趕貨”，“加機”、“趕貨”吞噬了她的青春！阿鳳滿腔的怒火，湧了上來。不知是因為惱怒，還是身體尚未復原，頭部一陣劇痛，阿鳳恐怕又在街上暈倒，只得強忍着怒火，急急的走回家。

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阿鳳每當精神好些就到處走走，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結果阿鳳到了另一間電子廠工作，但身體還是老樣子，一遇到緊張，或者受到刺激就會暈倒。有一次，也是在開工時間暈倒了，連頭也撞穿了，被送進醫院縫了六針。出院後，老闆一聲：“身體要緊，你沒有能力做這行了，還是回家休息吧！”就又把阿鳳開除了。

“我還不到二十歲，就被折磨成這個樣子，今後的日子怎樣過呢？我的青春就是這樣的完了嗎？”

阿鳳在心裏反覆的問自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的電子工人遭受增加勞動強度的壓迫到了何等驚人的程度！特別是美國老闆為了賺更多的錢，不斷地把生產的標準數加了又加，自動生產綫越開越快。在老闆的監視下，工人被迫沒命的趕貨，不要說二十歲左右的熟練工人（她們在行內已經被叫做“阿婆”了）受不住，就連精力旺盛的十五、六歲眼利手快的小姑娘也捱不了，要整天靠擦藥油支撐。近年來大多數廠都推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就是省回工人一天工資，但却把六天的生產量分配在五天裏做完，時間縮短，工資減少，而產量不變，甚至還要增加。這樣，在工人身上的勞動量就越來越加重，像阿鳳這樣的慘劇，只能有增無減。

資方為了使工人能“合作”地工作，往往增加管工，制定

苛例，監督工人工作。據一些材料統計了三百零五間電子廠，工人共四萬零八十七人，其中就有七千二百九十個管工；平均每五個工人就有一個管工，管得工人們真是動彈不得。有些工廠還要限制工人如廁，工人如廁要輪流領牌仔，一個有二百人的工場只得兩個牌仔，有些甚至離譜到要問原因才准上廁。有一間美資電子廠，一個年僅二十一歲的女工，就是在緊張的勞動、沉重的苛例限制下，年年、月月、日日地工作，因而精神過度緊張，有一天放工後就暈倒死去了。很多電子女工患職業病，如神經衰弱、頭痛、貧血、風濕、胃病、鼻炎，比比皆是。年紀輕輕的就被人家叫做阿婆，如果一旦被開除出廠或離廠，想到另一間工廠工作，十八、九歲就說超齡，不獲錄用了。她們的身心受到多大的摧殘啊！

後來，阿鳳在工友們的關懷、幫助、鼓勵下，堅強地活下去。日間，她拿點外發的衣服回家，同媽媽一起車縫，幫補家計。但她還常常惦念着仍在“拉”前操作的姊妹們。有時，工友們也會約她參加旅行，告訴她一兩個好消息：

“昨天老闆不得不撕去制定新苛例的通告！”

“老闆答應暫不加機了！”

“老闆答應不開除那個懷孕的梅姐了！”

阿鳳開心的笑了，她體會到了工友們團結的力量。

海 上 的“奇 蹟”

海員 偉 志

海在沸騰，風在咆哮。十號風球高懸，颱風侵襲香港，暴雨傾盤，交通停頓，人們早已返回家中，避免意外；一些居住環境危險的人們，早已撤到安全的地點暫以棲身。

廣播電台在天氣報告之後，發出了令人擔心的消息：“明達公司屬下的‘富達’輪在本港東南一百浬附近，遭遇颱風侵襲，船隻傾斜三十度，船上發出求救信號，準備棄船，船員已登上救生艇。”

“媽！爸爸的船遇風出事呀！電台正在廣播。”明叔的女兒阿娟飛奔入廚，告訴正在廚房做飯的母親。

“吓！沒有聽錯吧！”明嬌放下菜刀，匆忙地來到收音機旁呆呆地立着，等候着噩耗的傳來。

這時，同屋的人都圍在收音機旁與明嬌一起站着，默默無語，都為明嬌擔心。

明嬌已是個中年婦女，圓圓的面孔，配上一雙明淨的眼睛，雖然僅四十多歲，可是短短的頭髮已添上幾根白髮。明叔出了海，她便帶着十四歲的娟女和五歲的兒子海生。白天她

要到工廠去車衣服，這才能彌補家庭開支的不足。今天，颱風襲港，工廠停工，明嬌帶着孩子在家，海生還沒有起床。可是不幸的消息隨着颱風而至。

明嬌喃喃自語地說：“難道阿明這次真的要出事？”明嬌咬緊了牙根，強作鎮定，可是腦海裏却翻起了一樁樁的往事。

八年前，娟女還是六歲的時候，明叔的船，載滿鐵板在印度洋海面觸礁擱淺，迅速沉沒，明叔與工友們爬上救生艇，在海上漂了十六天。三個兄弟在船上受飢餓，受疾病活活折磨而死，一個個屍體拋到海裏。最後，救生艇漂流到緬甸，明叔才被緬甸人民救起。他隻身返回香港，直至抵達家門，明嬌才知道。

第二次是在五年前，明嬌身懷六甲將要臨盆的時候，明叔的船又在菲律賓以北的台灣海峽附近遇風，鐵板漏水，船身逐漸下沉，明叔又在海上漂流了三十小時後才獲救。明叔返港之日，明嬌正入院生產，產下了一個男孩子，明叔把孩子取名海生，用以紀念這次海上逃生的事件。可是事隔五年，海生還未懂事，沉船的悲劇又降臨到明叔的身上來。

痛苦的回憶把明嬌帶回了無情的現實。

現在明叔的處境怎樣呢？廣播電台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同居的人都為明嬌焦急和分憂。大家都在議論紛紛，不知是誰提議：要及早弄清真相，就要到船公司問個究竟。

“渡海小輪都停航了，這麼大風大雨上街也有危險呀！”

“危險，風雨大，怕什麼！還是要到船公司去問個究竟。”明嬌安頓了娟女照顧熟睡的弟弟，告別同居，披上雨衣，頂

着狂風，冒着暴雨，趕上了隧道小型公共汽車，來到明達公司。

這時，狹小的明達公司早已擠滿了“富達”輪船員的家屬，海員工會的代表也到了這裏和家屬們在一起。不少家屬站着詢問丈夫、詢問父親、詢問兒子的下落，公司的職員忙得不可開交，也帶着擔憂的心情回答着家屬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並請大家安靜、冷靜地等候，一俟有消息即會告訴大家。

在公司船員部的等候室內，家屬們有時議論紛紛，有時靜得鴉雀無聲，每個人都緊皺雙眉，整個寫字樓都籠罩着一片極不尋常的氣氛。

明嬌也像其他的家屬一樣坐着等候……。

過了很久時間，經理室敞開了門，走出了一個穿青綠色薄絨西裝，個子高瘦的男子。只見他兩額高聳，鼻梁架上一副鑲着金邊的眼鏡，前額特別高，頂上的頭髮成“凹”字形，稀稀疏疏的剩下不多。他手執一張小字條，走出辦公室，來到海員家屬的中間。這時，大家都緊張地圍攏起來，一位公司的職員向大家介紹說：“這是我們公司的張經理。”

這位張經理輕咳了幾聲，才打開了嗓子說：“各位家屬，這次“富達”輪遇險，我們和你們一樣感到非常心痛。我們全船載上了大木，價值五百多萬元，看來這次遇風可能已經沉沒了。但是，船員全部已落了救生艇。我們根據大家的要求，已僱請了兩艘拖輪前往現場搶救，現在正在辦理簽約手續。希望到時能有好的消息。要是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們便會立

即通知大家。”話剛說完，他便站起身來要走了。那邊坐着一位五十歲的輝叔，他是個老海員，兒子就在這船當打磨。他搶着向這位經理發問：“請問你們公司這個航次裝了多少貨？公司什麼時候收到求救信號？你們公司作了怎樣的指示？”

輝叔一連串的發問，道出了海員家屬們的心聲，大家都指責公司應對這些問題作出交待。

這位張經理受到家屬們的責問，愣住了一陣，才支支吾吾地說：“我們載的貨都是正常的數量。“富達”輪的遇險，主要是遇上颱風，因為颱風來得突然，這是很難避免的。當船發出求救信號的時候，我們公司已盡快、盡一切力量搶救了。還有我們將會請海事當局給我們支援，希望他們能作出努力，請大家相信我公司，我可以發誓，我沒有欺騙你們。”

時間匆匆的過去，可是船員的消息還是杳然。家屬們拖着沉重的脚步，帶着滿腔憂鬱的心情離開公司。這時，夜幕已經低垂，燈火已經放亮，風還是那樣地狂吹，雨還是那樣地猛打。

第二天風球剛除下，天剛亮，“富達”輪的海員家屬們又趕到公司，探聽親人的消息。公司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只說拖船已趕到肇事海面上，但找不到“富達”輪的蹤影；航經附近的船隻，也趕到現場，也沒有什麼發現。家屬們心急如焚，大家決定要派代表到當局有關機構，要求設法做好救援及搜索工作。該處表示聽取大家意見後，將向上級反映。到晚上得到的消息是：當局已派出艦隻及飛機開赴現場搜索，可

是現場風浪太大，視野不清；並說似此狂風巨浪，船員恐怕難有生存希望，除非“奇蹟”出現。軍艦及飛機已返回本港，已停止搜索。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到第四天才在現場附近海面上發現“富達”輪的一艘救生艇，艇上空無一人，海面上還漂浮着約一浬長的油漬。其餘什麼跡象也沒有，當局宣佈放棄搜索了，又一次表示除非出現“奇蹟”，否則海員難有生存希望；這時公司也表示考慮放棄搜索。可是，在家屬們的極力指責下，公司才被迫繼續設法搜索。

難道“富達”輪全體船員真的絕無生還的希望了嗎？全船海員已葬身大海中了嗎？搜索的工作真的應該放棄了嗎？

就在有關當局估計不會有“奇蹟”出現，宣佈放棄搜索，公司也考慮準備收兵的時候，明叔正與同船的兄弟們在狂風駭浪中與死神展開激烈搏鬥。

在返港的航行中，“富達”輪在南海遇到颱風，發出了求救信號以後，風浪又逐漸增大，船身先是左右搖擺，後是變成傾側一邊，船旁的氣窗已壓在水底，磨擦着海浪前進，眼看船隻就快翻倒了，船長即發出棄船命令，一時警鐘大鳴，兩分鐘內船員分別齊集到預定的救生艇的位置，點齊了船員人數正準備放下第一號救生艇時，突然一個巨浪蓋過來，纜繩斷了，一號救生艇被風浪捲去，遠遠的漂在大海之中。這時全船二十八名船員立即齊集到第二號救生艇，幾經艱辛才把救生艇放下海中，二車立即開動了艇上的發動機，迅速駛離“富達”號，大概離開約三百碼左右，“富達”號即完全翻倒了。海面

上像裂開了一個大口把船整個吞下。這時在風浪聲中，突然響起一陣爆炸聲，是主機和鍋爐進水引起爆炸吧？在輪船下陷之處，突然噴起了無數的雜物，這個景象歷數分鐘才停止。

在救生艇上，明叔和同船的兄弟大家都慶幸能及早放下救生艇，離開船旁，否則可能與“富達”輪同歸於大海了。但風還是那麼緊，浪又是那麼急，在大洋中的小艇，不時受着五、六層樓高的巨浪壓下。艇上雖然載滿了水，但有很大的浮力，這時，大家都在互相鼓勵：“要鎮定、冷靜、握緊攀手，堅持下去，就可得救。”

救生艇頂着風浪慢車前進，可是船員們的腦海並沒有平靜，在這緊張的搏鬥中，他們回想起這個危險的航次：

三天前，在婆羅洲一個港口，“富達”輪正在裝載大木。這艘船是日本建造，下水只不過五年，機器還是挺好的，可是，船殼已非常殘舊了。可不是嗎！婆羅洲——香港——日本，一個多月一個航次，不停的行走；老闆爲了賺錢，哪裏來得及保養！加上鐵板單薄，裝載的又是大木，幾噸重一條的大木，吊上吊落，撞向船邊，撞向艙口，處處都是凹凸不平，處處都是鐵錆纍纍，可以說是遍體鱗傷了。

這次，船到港口，代理行特別派人來告誡大副，總公司來電責問：“上次載貨太少，這次要比上次多載五百噸，否則你的職位難保。”確實，這一年來，船上的大副已撤換了三個，原因就是載貨量不够，未能使東家滿意。這時，大副已加倍落力，特別小心，處處都爲能多裝一條大木想辦法。大木在櫃面一層層疊上去，最頂的一層差不多已和駕駛台拉

平了。可是，那代理行的經理還未滿意，定要大副把船邊的那批大木裝上。實在無法把這批大木裝上了，載量已超過“燕梳嚙”（保險線），海水離甲板只有三、四呎，大副和代理行的經理吵起來了，大副嚴正地表示：“如果定要裝上這批大木，我願意做第四個大副。”最後，還是各人讓一步，大副答允再裝四條，安放在船旁船員的通道上。

船從婆羅洲開出，風平浪靜，水平如鏡。晚上，船員們都在船尾乘涼，談天，年青海員像往常一樣圍着副水手長明叔，要他講航海的經歷。

明叔確是令人喜愛、受人尊敬的長輩。他平時說話不多，但說起話來却滔滔不絕，而且他的話說得有理，因為他見識多，生活也很豐富。他從十七歲起便跟父親上船當海員，漂洋過海，歷盡滄桑。他雖然識字不多，但努力看書看報，研究問題，技術也非常精湛。同時他還有一個關心集體的精神，對待工友很和氣。他有一雙烏黑圓亮的眼睛，上面配着一雙濃黑的粗眉，說起話來鏗鏘有力，嘴角總帶幾分笑容。

這一晚，年青海員嚷着要他講述他兩次死裏逃生的遇險經歷。明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把聽衆帶到八年前的“金星”輪上去。

明叔說：“八年前，我在‘金星’輪上當水手，船載滿礦砂，從非洲去日本，在印度洋上航行。一天深夜，人們都在熟睡中，突然船身劇烈震動，跟着主機突然停了，我隨手拿起放在床邊的電筒，揹上救生衣，穿上了鞋，走出房間，跑上檻面，但見四周黑沉沉的；藉着船尾桅燈的微光，隱隱約約

地可以看見海面上的水光。我發現船尾經已迅速下沉，這時，我立即跑回船艙，通知大家。原來各人也被輪船劇烈的震盪驚醒，已爬起了床，大家都叫嚷輪船擱淺了，個個揹上了救生衣，衝上櫃面的救生艇處，各人站好了位置才發現少了一個江仔。我想他一定是還在房間熟睡，我一邊高叫：‘江仔，江仔’，一邊飛速走回船艙，撞開江仔的房門，江仔還蒙被大睡，我用力把他拉醒，大聲喝道：‘船擱淺入水了！快走！’隨手爲他挽着救生衣，他來不及穿面褲，水已嘩喇嘩喇地湧進房間來了。我拖着他的手，回到甲板，跳上救生艇。當救生艇剛落到海面上，船上的住房已下降到海面上，前後只不過十分鐘，‘金星’輪就不見了。”

明叔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所以，我平時經常提醒你們年青人不要熟睡，船身打顫，主機一停，馬上就要起床；手電筒，救生衣要放在最順手的地方，道理就在這裏。”

“由於事出倉卒，電報生來不及發出求救信號，經已棄船，全體船員分乘兩艘救生艇就在海上漂浮。一艘在事發後第五天被貨船拯救起；而我們乘坐的那一艘却一直遇不到船隻救援。幸好當時海上沒有風浪，救生艇就在海上一直漂流。我們知道，艇上只有七天的伙食，必須盡量節約。起初，每人每餐只分得兩塊餅乾，兩粒糖，半電筒蓋淡水。每天下雨，我們都張開口，吸吮雨水；張開衣服盛載雨水，衣服濕潤了就把水扭在罐內，以便備用。有時，海鷗飛到艇上，我們便用木槳把它打倒，脫去羽毛，大家分食牠的肉和飲牠的鮮血。有時僥倖地釣上幾條魚，同樣也是共同分食了。可

是，十天後，我們的糧食都吃盡了，就是靠雨水、海鷗、小魚來維持。最後，雨水也沒有了，只得飲上自己的尿。缺水、缺食，加上炙熱的太陽蒸晒，把我們每個人的皮膚晒得刺痛，全身呈現了一點點的紅斑，又痛又癢。

“這時，人的意志非常重要，我們大家都互相鼓勵，有些講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有些講述《沙家浜》劇中新四軍捱餓抵餓的堅持在蘆葦蕩中的事蹟，用以策勵自己和同事。但是，有些同事受不了這種嚴重的折磨，先後病死、餓死的有三個之多，他們都葬身海中了。

“到了第十六天，當我們的艇漂流到緬甸附近的海面時，被當地漁民救起來，艇上的人，個個都已動彈不得。”

明叔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後，又說：“這次遇險，要是沒有大家的團結，沒有大家的互相鼓舞，恐怕就不能堅持十六天，無法和你們同船了。”

明叔和青年海員們不約而同的發出了勝利的爽朗笑聲。水手張仔遞來了一杯濃茶：“明叔，潤潤喉吧！”

喝過了茶，大家又要求明叔繼續講下去。

“你第二次遇險的情況又怎樣呢？”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在‘華民’輪上當舵工，這艘船是一艘老爺船，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後下水的勝利型。船齡二十五年，船身的結構非常單薄，這類船拆的拆，沉的沉，現在留下來的恐怕沒有幾艘了。但是，只要有錢賺，‘死馬也當生馬騎’，船身只值五十萬美元，而老闆買保險就花了一百萬美元。

“下雨時，船員房間處處都漏水，但是不會積水，因為踏腳的鐵板也處處穿洞，海水、雨水都可以漏入艙裏。一些工友弄來幾塊夾板鋪在上面，以免不慎踏進‘陷阱’。船頭的甲板，也是霉爛了，但船東爲了慳荷包，不肯換鐵板，只在船頭甲板全部鋪上瀝青，就算了事。

“晚上睡覺時要緊記點蚊香，否則睡到天亮，滿面、四肢都是蚊口。更令人討厭的是：廚房及餐樓已成爲老鼠、蟑螂出沒之所，廚房裏的下水管長期淤塞，漬水發臭。在餐樓，白漆已變成黑漆，連坐椅也沒有一張好的，還是木匠用板釘了兩張長檻，才有得應用。餸菜擺開，蟑螂成羣結隊爬在其中。有什麼辦法呢！這艘船被公司購進五年以來，從未有燻過硫磺，也沒有噴過殺蟲水，船上甚至連殺鼠藥也沒有，怪不得有些工友稱之爲‘國際老鼠竇’了。此話確有根據，我親眼見過在印尼碼頭，成羣老鼠沿着船頭纜走上船來；我又親眼看見在澳洲碼頭，成羣老鼠沿着尾纜走上岸去。總之，這船的設備和衛生實在要不得。

“船在沉沒前已有跡象，也曾出現過兩次艙底鐵板穿洞的事故。一次是在澳洲開往台灣途中，機房部發霉的鐵板穿了一個大洞，海水像救火喉一樣噴出，射進機房；一位生火試用身體壓住洞口，但多次嘗試，由於水壓太大，均被彈開。最後搬來了大木，墊上一塊厚厚的膠板，才把洞口塞住。駛來香港，老闆還不肯作徹底修理，只澆上一堆水泥，把洞口塞住，便開往台灣，在台灣卸清了貨物，才在洞口補上一塊鐵板，便算了事。”

“第二個航次，船到澳洲，裝載小麥。水手們正在打掃大艙，在陰暗的角落裏，發現射出了一束強烈的白光，原來船艙上半部的鐵板已穿了一個碗口大的洞眼，陽光就在那裏射入。最後，公司又是補了一塊鐵板，載上了小麥，就開航了。幸好及時發現，否則載滿了小麥，開到半海，這船可能在這次便結束了。

“第三個航次，船又從澳洲裝載礦砂，開往台灣。船航至菲律賓以北的巴林坦海峽，是凌晨時分，海上風和浪逐漸加緊，船頭頂着十多呎高的巨浪前進。根據天文台氣象報告，在船後面有股颱風形成，船的前頭又是一片低氣壓。當晚，我在艤房值更，對這些現象已特別注意。到凌晨二時左右，船頭好像越來越重，逐漸下沉，我通知了當值的副長，他馬上通知船長，當船長跑進駕駛室的時候，船頭已沉在水中。第一艙甲板開始平水面，我意識到危險的時刻來臨了，馬上穿上了救生衣，船長通知電報員發出求救信號；跟着突然向我下令，‘右滿舷！’我遵照命令馬上回答：‘右滿舷！船長！’船長此舉企圖把船擺向後轉，用船尾頂住風浪的壓力，再作打算。眼看船頭已逐漸向右移動，正在移了一半的時候，巨浪在船的左邊壓來，第三艙的桅桿突然塌下，發出隆然巨響，全船劇烈震盪；塌下的桅桿打斷了風喉，海浪通過風喉湧入機房，機房的發電機立即被海水淹沒，全船電燈馬上熄滅。這時，船身已向右邊翻側，船長一邊拉響了警報信號通知全船，一面高聲向我喝令：‘阿明棄船，馬上逃走。’

“我放下了舵，向左邊走，衝出駕駛室。我執住船邊欄

杆，正想看看舢舨的位置，但船身已翻轉過來了。我拚命緊握着欄杆，跟着，我的身體已墜進海中。我意識到在這種情形下不能立即放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船身慢慢把我墜下，我堅持着，身體已淹沒在水裏，吸了幾口水。過了一會兒，覺得船身搖動沒有那麼大，並且下墜已比較緩慢了，我便放開了手。救生衣的浮力把我從水裏托到水面來，我雙手護住了頭，怕在上升到水面時頭部碰到硬物。果然，頭頂水面上浮着一塊艙板，我避開了它，但又拚命地抓緊它，有了救生衣，架上一塊木板，我覺得自己好像有了雙重保險。這時，藉着月亮的光線，定神細看海面，發現一名服務生也浮在離我十多呎的左邊，我高聲呼喚他的名字，抱着艙板向他推進。於是，我的木板多了一位同伴了。不久，我們又發現左邊二十多呎的海面上有一團黑色的物體，再定神細看，原來是船上的橡皮筏，上面還坐着兩個人。我和服務生游向橡皮筏，在皮筏附近浮有七、八個人，都向皮筏游來，我和服務生利用木板的浮力一個個地把他們推上皮筏，最後，我讓服務生先上。當我推他上去時，才發現他的下身光着，沒有褲子；後來才知，他的褲子在輪船下沉時，被水的吸力吸脫了。

“我們十二人經過了三十多小時的海上搏鬥，被航經那裏的船隻發現，搶救回來了。抵港時才知道，另有十四人的皮筏亦被救起，但這次老爺船遇險，奪走了我們四個兄弟的寶貴生命。”

‘老爺船真是要命船！’

“這不能怪船，主要的是人作怪，老闆和有關當局應該負責任。”

“為什麼？”

“因為船公司爲了省錢，船隻長期缺乏保養和修理，不管鐵板霉爛與穿洞，只要船能開航便算了；至於危險與否，船員的死和活，公司老闆的眼睛是不看的。”

“船是規定一定時間要修理的，修理好還要經過有關官員的檢驗和批准，難道爛船也批准航行的嗎？”

“驗船手續只不過例行公事而已，在此時此地，‘有錢使得鬼推磨’，有‘水’就可以行船了。”

“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誰個老海員不知道，驗船老爺到，公司的主管人當然要在船上殷勤、熱情的接待奉茶遞烟，招呼妥當，不在話下。當檢查工作開始時，這位老爺就脫去外衣，掛在壁上，換上工作服，拿着鐵鎚，到船艙各處敲擊，巡視一番。經過一段時間，他再回到原來的地方，摸摸壁上的衣袋，如果袋裏多了一些東西，這時，驗船核准與否，基本上就可以決定了。至於船開出以後，能否到埠，是否半途失蹤，他不管的。”

大家聽了明叔兩次海上的遇險經歷，得到了不少教益，豐富了航海的經驗，引起了大家爲輪船遇險沉沒問題展開熱烈的議論，整個晚上熱鬧非常。

可是，宿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沉船的遭遇竟降臨到“富達”輪船員的身上。

當日早晨，船航至香港東南一百浬，天氣悶熱，氣壓很

低，烟囱的烟重重地向船尾墜下，人們知道氣候在變幻。不久，電報員報告：“船的前頭有颱風，幾乎停留不動，後面有一股低氣壓伸展過來”。海上很快便翻起了沸騰的大浪。這時，船長命令把船駛向後轉，並致電公司。可是兩個鐘頭後，船長又再命令舵工駛返原來的航線，朝香港駛去。三個鐘頭後，海水已翻滾了，整個船顛簸不定，左右前後，不規則的搖動，輪船本身已無法控制自己，像空中的紙鳶，隨着風和浪的轉動而轉動。明明是白天，可是天色却是黑沉沉的，天上覆蓋着雨水積聚的厚厚的雲層，就在“富達”輪的頭頂上打滾。雨有時會突然靜下，但有時却像萬箭齊發似的向甲板上射來，雨點大得像花生米一樣，甲板發出“噠，噠”的響聲。突然，第二、三艙甲板上右邊的大木鬆了綁，一部份的大木被風浪掃落海，船身馬上側向左邊，船長發電報向公司報告情況，跟着發出緊急信號。這時，明叔和全體船員看到船的處境，個個都作好了準備，人人都揹上了救生衣。不久，“富達”輪已逐漸向左邊傾側，十五度、二十度、三十度，最後，船長命令發出 S · O · S 求救信號，並宣佈棄船，全體船員登上救生艇。

救生艇頂着風浪慢車前進。二十八名船員的心稍為安定，船長才告訴大家，當他令“富達”輪回航避風時，公司竟然連來四封電報，責成“不能回航！”

“船上的木材什麼時候才能到港？”

“耽誤時間，這個損失由你負責！”

“馬上朝香港開來！”

船長接到這些指示和責備，不敢不依，只得決定依原定航線返港，以致上了公司的當，受到這樣的慘遇。

救生艇頂着風浪慢車前進，艇還比較穩定。可是，過了幾個鐘頭，燃油沒有了，發動機便停了。這時，風高浪急，救生艇已不由自主，任憑風浪吹打，有時在浪峯，有時在浪窩；有時被推前，有時被推後。明叔叫大家抓穩艇邊的繩索，不要慌張，不要走動；並鼓勵大家說：“我們的求救電報已發出了，只要風浪一過，便有船來拯救的了。”大家也只得懷着這樣共同的願望。

第二天中午時分，船員才知道肚餓，船主着令管事在糧倉內拿出餅乾、食水分給大家，大家正在吃餅乾的時候，一個像山丘似的巨浪撲來；它從艇底升起，把整隻救生艇從右推翻，食水、餅乾隨浪漂去。大家藉着救生衣的浮力，都向救生艇游來，你拉我帶地把各人拉到救生艇的因翻轉而露出水面的底部，這比人浸在水裏稍為好些。可是，點點人數，才發現船長、電報員及一名服務生不知所蹤，肯定是被風浪捲走了。後來，大家覺得這樣伏在艇底，長此下去，危險性很大，不是安全辦法。有人建議合力把艇翻轉過來。這建議得到大家同意。如何把艇翻過來呢？各人提出了意見。最後決定讓二十多人聚集在艇的下風一邊，迎着風浪，當大浪打來時，大家全身壓在一邊，使艇的另一邊微微翻起，藉着大浪的衝擊力把艇翻轉過來。結果經過了三次的失敗，第四次成功了，大家又重新爬上救生艇。當時，海水貫滿了全艇，大家輪流搖動水泵，把海水泵出艇外。經過這次搏鬥，每個

人都筋疲力乏了。在艇上大家就手扣手，互相照顧，互相緊靠。

這樣又過了一天。第二天傍晚，風浪還沒有停，突然一個巨浪又把救生艇推翻了，大家還是迅速靠近艇舷，照舊辦法企圖把艇翻轉。可是，這次翻艇的難度比上次大得多；經過半小時左右，在大家的互相鼓舞下，才把它翻轉過來。點點人數，這次又被巨浪吞噬了十一名海員，其中有管事、服務生、大廚、二副、大車、二車、二名加油及三名水手。艇上餘下只有十四人，人人的氣力均已“搏盡”。一些體質較弱，年紀較大的人已處在半昏迷狀態。過了一些時候，大副翻開了食物倉，倉內只剩下一些罐頭、牛奶及果糖。大副拿了出來分給大家，沒有淡水，牛奶只得混海水渴了。三副的體質比較弱，第二次翻艇後一直不聲不響，抬不起頭；明叔扶住他，把他靠近自己的身體，抬起他的頭，還餵他飲了幾口“海水牛奶”，二副才清醒了一些。

第三天黃昏，風浪開始平靜了，大家心情比較開朗一些。這時，大家又互相鼓勵：堅持下去就能得救。

第四天，平靜地度過。第五天下午，船員發現遠遠海面上有一個小小的黑點，大約兩個鐘頭後，這黑點逐漸擴大，隱約間看見是一艘漁船的模樣，大家都非常高興以為得救了，一些人敲擊着船旁，明叔和一位加油船員，站起來用力搖動手搖的電報機，企圖引起漁船的注意。可是搖了一陣，搖柄突然斷了，再搖不動。眼看那漁船又由大變小，成了黑點，在眼前消失了。

這時，大家又呆了下來，整個艇及整個海都是平靜的。

時近黃昏，正在沉思中的身材高大的水手長，突然手舞足蹈，高叫起來：“我們得救了！我們得救了！”他在艇內來回走動，明叔向他勸導，要他冷靜一些，可是他哪裏聽得進去！明叔又勸導大家不要惹他，不要和他衝突。突然，水手長走向舵工前面，雙手握住舵工的雙臂猛力搖動，高叫：“我們得救了！我們得救了！”舵工忍不住，罵了他兩句：“你發神經！”

這句話激怒了水手長，憑着他的氣力，抱起了舵工，把他拋下海去。這時大家都餓得毫無氣力，無法阻止這水手長的癲狂行爲。舵工在海中也毫無氣力，動也不動了。不久，水手長又不斷地呼叫：“我們得救了！上岸去了！”“我們得救了！上岸去了！”連叫了幾聲他自己就跳進海去。

第六天，又有一些風浪，艇內海水又浸滿八成，連餅乾、牛奶都沒有了。近兩天來，三副已沒有說話，也沒有移動過。早晨，他全身發抖，直至中午，他伏倒在艇內的水中，一浪打來，三副便隨着水漂進海中。明叔眼見這些悲慘情景，心裏非常難過，但也没有氣力動手拉住三副。

第七天下午，一個舵工，一位厨司，餓得太厲害，已無氣力，坐着不動，跟着又伏倒艇中，又隨水漂了出去。

直到第八天，救生艇被公司派去搜索的拖船發現了，艇上只剩十名船員，他們已經四肢無力，動彈不得，眼睛血紅，皮膚變色。他們終於獲救返港，被送進醫院。

明嬌在醫院看到的明叔已認不出來了，他的雙眼下陷，

全身消瘦，雙眉顯得特別濃黑，頭髮鬍子都長長了。他需要留醫休息，爲了讓他好好休息，明嬌也不敢多問兩句。明叔畢竟又第三次海上逃生歸來了。

報紙以大字標題，大量篇幅刊登了“富達”輪十名船員獲救的“奇蹟”的出現。

“奇蹟”，這兩字真的引起人們的深思！“富達”輪十名船員獲救是“奇蹟”，而艇上一個個海員得不到及時救援，活活死去，這不算是“奇蹟”嗎？在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個現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地方，一個在世界海運上佔比較重要地位的港口，對港外附近遇險的船隻的救援和搜索，這樣不力而又這樣毫不負責，這恐怕才是真正的“奇蹟”！

在高樓大廈的背後

建築工人 李 辉

每當我坐上渡海小輪，眺望港島中區，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那一座座高大的樓房，那一排排凌空的人行道，盡收眼底。然而，當那高聳入雲，號稱什麼“遠東最高”、“設備最完善”、“建築技術最新”、“工程進度最快”的五十多層的××大廈映入眼簾時，就感到一陣刺痛。遠望那一個個像千百個血盆大口的圓形的窗戶，它吞噬我們工人兄弟的悲慘情景，又一幕幕湧現在我的眼前。這大廈的一沙一石都滲透着我們建築工人的血和淚呵！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春節，五十多層的××大廈已像一柱擎天，正在進行裝修工作。農曆年初五，我們建築工人陸續從鄉間回來上工，大家一面互相問候，暢談家鄉的新變化，一面準備好工具。當我們正等候大吊籠把我們吊到屋外做大廈外圍批盪的時候，突然聽到“呴！噠！”兩聲巨響，把我們一羣人的心緊緊地揪着。建築工地的這種突然巨響，不知已經奪去了我們多少工人兄弟的生命呵！我們立刻往下望去，看到吊籠已經掉到地下，臨時電梯也已經變了形。原來這次

是吊籠與電梯碰撞。幸好吊籠和電梯沒有人，否則從幾十層高的樓上跌下來，不變成肉餅，壓成肉泥才怪哩！我們都捏了一把汗。要是早幾分鐘，坐上了這個吊籠，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我們都慶幸逃過了“鬼門關”。

大老闆爲了趕工程，簡直不顧我們工人生命。每天，我們在僅用兩條“威吶”吊着的吊籠上工作，在幾十層樓高的空中搖來晃去，風刮大一點就會碰到與吊籠距離僅幾吋的電梯上，無論大家如何小心，意外總是難免。幾次提出了改善設備的要求，資方總是說什麼“不用怕，我已經買了勞工保險，跌死有得賠。”這簡直是收買人命。不久前，繼釘石屎板的成叔工傷死亡後，在安裝這座大廈電梯時，電梯工人寶叔又從十三樓跌下慘死了。當時工友們十分氣憤，在追悼會上的一幅挽聯上寫道“趕工程，謀暴利，視工人生命如草芥，毫無安全設備。憤兄弟，痛喪生，必需化悲憤爲力量，定要團結鬥爭。”這幅挽聯寫出了我們工人的心情。大家憤怒地向工地總管進行了交涉，要求改善安全措施。但資方一拖就是十幾天，措施毫無改善。每天，每天都提心吊胆地去開工，心中陰影重重。

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我們又像平日那樣，機械地進入吊籠。寒風凜烈，身上有幾分寒意。隨着吊籠從幾十層樓高的空中下吊，“威吶”和鐵輪發出刺耳的磨擦聲，儘管我們是一貫在高空工作的建築工人，但向下望去還是有點不習慣；加上這座大廈的建築沒有用傳統的搭棚方法，我們站在鐵籠內在空中飄來蕩去的做批盪，空蕩蕩的使人目眩，更談不上有絲

毫的安全感了。“威吔”把我們吊到了三十二樓的外牆，我們就照着往常一樣，我做中間，亞坤和亞強做兩側，學徒新仔就做幫手。一直做到九時半左右，我先完成了自己負責的外牆批盪，見亞坤和亞強仍未搞好，我就停下手，等他們完成後再批盪一層。就在這時，運貨電梯在迅速下降，電梯定力鉈在急速上升。就在這一剎那，電梯定力鉈和吊籠發生了猛烈的衝撞，發出隆然巨響。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整個吊籠，就在三十二樓的高空上被撞翻轉，在毫無安全設施下，我狂亂地抓着一些東西，眼睜睜地看着亞坤和亞強被拋離了鐵籠，亞坤拚命地企圖攀着窗口，但抓不着；亞強被彈開；只見他們一直飛下去。新仔則拚命抓着窗口。我狂呼着，毫無辦法。接着我又被猛烈地撞擊，頓時失去了知覺。不知過了多久，我恍如隔世地被人叫醒，原來是新仔，他攀着窗口，打了個觔斗，爬進窗內。而我昏迷後從窗口彈入屋內，撿回了性命。我們互相看看，沒有什麼事，就一口氣跑上四十二樓，通知正在工作的工友，和他們一齊跑到地下救人。我們看到，日夕相處的工友倒臥血泊中，血肉模糊，已經奄奄一息；亞強更連雙腳也飛離身外。我不禁悲憤萬分，大老闆只顧暴利，又奪去了我們兩位工人兄弟的生命。

悲劇頃刻間震動了整個工地，頓時工友雲集，悲痛的氛圍籠罩着工地。我陪伴着人們送走兩位死難工友，有些工友去安慰家屬，更多的工友立刻展開捐款，支持死難工友遺屬的生活，組織與資方交涉。

事情雖然已過去了幾年，儘管建築工人新的悲劇不斷地

耳聞目睹，但親身經受，使我幾乎已成白骨的那一幕仍然銘刻在我的腦海裏。每當我看到亞坤和亞強遺下的級高級低的兒女時，我就想起當噩耗傳到他們家裏時，坤嫂和強嫂哭得死去活來的情景。他們那白髮蒼蒼的母親痛哭欲絕，從此妻失丈夫娘失子，兒女成為無父的孤兒。那天，坤嫂對着七個尚未懂事的兒女（大的女兒十多歲，患上小兒癲癇症，小的兒子只有四個月大）以及亞坤七十多歲的母親，悲痛地哭道：“今後我怎樣支撐這個家呢？”強媽看着身邊年幼的孫兒，淚如泉湧。二十多年的往事湧上心頭，想着亞強自小失去父親，辛辛苦苦捱大了亞強，只有二十五歲就被萬惡的社會奪去了生命。亞坤、亞強的死難，多麼深刻地反映了我們建築工人的悲慘生活啊！

我凝視着眼前華麗的酒店、高聳的銀行、凌空的天橋、繁忙的海底隧道交通網，哪一處不沾滿着我們建築工人的鮮血呵！就以香港當局公佈的大為縮小的數字來看，這小小的香港，平均每三十五分鐘就有一個建築工人因工受傷或死亡。一九七四年，工傷死亡的工友就達五十二人，傷者更高達近五千人。

“一廈建成血淚多！”這正是千千萬萬建築工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控訴。

司機與禁區

司機 周一球

嚴冬，黑夜籠罩着香港，在青山精神病院的亞日，心情格外沉重，他喃喃自語：“我没有瘋，我没有瘋！我的家人要生活，我要出院！”

亞日講得對，他沒有瘋，至少，他不是瘋癲。但，誰使他入精神病院？！又是誰迫他精神緊張，以致有點神經錯亂呢？！

亞日昨天還是好好的，今天却被關在精神病院。在那裏，周圍都是瘋人：呆呆的坐着、痴痴的笑着、漫無目的行着、雙目瞪着，或痛哭，或機械地做着某種動作……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的受害者，亞日就是其中的一個。

就是在昨天晚上，下着微雨，冷冷清清的，行人特別稀少。亞日緊握小巴的舵盤，瞪大雙眼張望，緊張地盯着每個行人，即使是一個微小的動作，他也馬上靠近去停下，打開車門；但是，又立刻失望地把車門關上。

夜更深沉，天更是黑壓壓的，亞日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望一下車廂內只有零星三幾個乘客，再看看車頭的錢盒，也寥

寥無幾；盤算一下，今晚又要倒貼了。已經將近九點鐘了，“黃金”時間已過去。肚皮在打鼓，眼皮又不斷地垂下，該去“加加油”、“提提神”了。

食店中，一班行家已經聚集一堂，不愁寂寞。亞日走進來，大家讓出個空位給他，又再高談闊論起來了。身旁的“馬王”黑仔，氣忿地說着：

“……好似搶一樣，那條‘白鮓’（交通警察）躲在暗角，我一上客就衝出來，又一張‘牛肉乾’（告票），已經第四張了。”說時，他把一疊告票拿出來，擲在枱上。

“世侄，看開一點，人家正在喊窮呀。看，我也有一張，”有名的“萬世魔王”（慢駛“麼”王）陳伯也拿出一張告票來示衆。

黑仔餘怒未息。說，“昨天才上庭，那法官用電腦查案底後，就說，上次罰你七十元，已經算優待你，今次要罰一百元，這是公價。今日這張實際又是紅底（一百元）了。”

“想當年，拚命拍膊頭，如今拚命設禁區，拚命派‘牛肉乾’，連罰都起價！”

陳伯接着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呢？”

“無非想多榨些油水，想把我們小巴趕絕！”黑仔隨口就答。

“對，快而準！”陳伯故意用嘉獎的口吻說。“不愧有‘馬王’之稱。”這一說，引起了哄堂大笑。

可是，亞日沒有跟大家一起笑。他摸着袋中的告票，雙眼凝視着面前的那碟飯，腦海中浮現出今午開工前在家吃飯時的情景：

窄窄的一間房裏，三個小兒女嚷着準備上學，日嫂擺開飯沒有食，七十多歲的老母親照顧着幾個孩子。亞日環視一下，發覺大女兒不在，便問“她在哪裏？”母親嚥下一口飯，說：“大妹去找工做，未回來。”這使亞日觸動很大。為什麼，為什麼大女兒才十三歲，本來在暑假就小學畢業了，現在却被迫停學，去找工做來幫補家用？這個淡風吹襲下的環境，能找到什麼工呢？能幫補多少家用呢？

不是嗎，日嫂本來是製衣女工，但到九月，她所做的工廠倒閉，從那時起便失業了；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平日除了料理家務，還在附近小廠取些小五金回家做，飯後一家動手，每日還可賺到十元八塊，可是最近也沒有得做了。生活的擔子，重重地壓在亞日的肩上。

亞日是個老實人，是駕駛夜班小型巴士的司機。平時，他一家的生活還可以勉強過得去，可是在一九七四年第二季以後，香港經濟衰退，工商百業遍吹淡風，工人失業、半失業情況嚴重，人們收入大減，迫使大家要在生活開支上可省則省，乘搭小巴的也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司機們每日的開銷却反為增加。車租加至六十六元（日班車租由五十五元至六十元，夜班六十五元至七十元），入汽油也要二十多元，連在外面吃一餐飯和一些必要的雜用，開支已近百元。當日的收入超過一百元，才有錢拿回家；如果接到一兩張“交通違例”的告票，那就還要自己拿錢出來倒貼。最近這個時期，亞日已是盡量節省了，但每天也只能拿二十多元回家，在這百物騰貴的景況下，七口之家實在難以維持的。

亞日不僅擔心生活，而且更擔心“抄牌”，因為一塊“牛肉乾”，過去還是罰三十元、五十元（兩日的工等於白做了），現在動輒要罰七十元、一百元，還要上法庭。他摸着袋中的告票，禁區、告票、罰款……不斷的在腦中繚繞，像千斤鐵錘向他壓下來、壓下來！

“這麼多禁區，怎樣生活呀！”亞日喃喃自語。

禁區，對每個職業司機的精神威脅最大，精神負擔最重，當局對小巴正是步步進逼，加強管制，擴大禁區，拚命抄牌，加重罰款，甚至停牌威脅。迫得小巴司機寸步難行，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禁區之多，把道路變成“斷樞禾蟲”，這一段不禁，那一段禁；這段時間禁，那段時間不禁；對面馬路不禁，這邊馬路就禁，……處處佈下陷阱，這樣，就算是熟練司機、“老行尊”，有時也被弄得頭暈眼花。何況，小巴司機還要負責上客落客，開門關門，收錢找數，一個不留神，又是“牛肉乾”一塊。

生活的重擔，交通禁例的繁多，迫得亞日走頭無路。

“砰！”亞日精神受到重壓，不由自主地把面前的枱重重的一拍，站起身來。陳伯和黑仔他們忙問他為什麼“這樣壞脾氣？”但他一言不發，往街外走了出去，口中仍然不斷喃喃自語：

“駕駛十四座，兜來兜去無人坐，再打一個‘冷’（圈），告票多籮籮。……”

經過差館，他思潮起伏，站在門口，久久沒有離去。

天將發亮，亞日還未回家，家人都很焦急。突然電話鈴

鈴作響。

“日嫂， 你們的電話， 是差館打來的。”頭房的包租人說。這一個電話， 驚醒了全屋的大大小小， 更使日嫂一家震驚。是交通失事嗎？還是……。日嫂戰戰兢兢地走去接電話， 拿起話筒：“喂……”

亞日進了精神病院， 這真是晴天霹靂！亞日的一家發生了嚴重的變化。

亞日被迫進入青山醫院之後，家庭全無入息。他一家的生活費用，包括每個月一百三十元的房租，從何而來呢？他的家人甚至連去青山探“病”的車錢都難以籌到，亞日的一家陷入極度的困境。

幸好，工會和工友們不時進行經濟上和精神上的關懷和慰問，亞日逐漸有所醒悟，他明白了是誰迫他入青山醫院的。他說：“陳伯講得對；我們小巴疏導交通，便利市民，好處不少。可是當局爲了大財團的荷包，步步進逼，使我們‘冇啖好食’。我們一定要團結才好。我沒有瘋，我要同醫院講明，早日出院。”

春節前夕，被“困”在青山一個月的亞日，踏出精神病院，迎着陽光，跳上小巴，依舊同陳伯、黑仔他們，奔馳在大馬路上。

新嘉坡加

H. K. \$ 1.70

Printed in Hong Kong